

6.4

震撼世界的七週

1989天安門事件



目 錄

中文繁體版·前言	2
前言	7
天安門事件：震驚世界的七周	8
天安門事件與工人階級	13
「6·4」之後	21
見證中國——天安門事件	28
中國群眾運動大事件年表	45

中文繁體版·前言

在 2009 年「六四」20 週年之際，這本關於 1989 年 6 月 4 日北京所發生的血腥大屠殺的小冊子首次出版了簡體中文版。在此後的幾星期內，該書就遭到了中國當局的禁止，但仍然得以通過互聯網等方式秘密地散發了數千份。現在，工人國際委員會（CWI）在香港及中國的支持者組織的社會主義行動首次推出繁體中文版，以便能使香港市民和海外華人社區可以更廣泛接觸到這一資料。

無論名不副實妄稱「共產主義」的黨國多麼努力地嘗試抹滅「六四」的痕跡，但「六四的幽靈」卻仍然四處遊蕩。儘管擁有世界上最先進的互聯網警察管制體系，並對報導相關事件的媒體徹底予以取締，但是新的一代青年仍在努力尋求真相。當局一直企圖利用令人印象深刻的國內生產總值（GDP）經濟增長數字、世界紀錄的建設熱潮和中國不可阻擋的崛起等資訊來埋葬 1989 年的記憶。

打壓——恐懼阿拉伯「流感」

由於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現在中國已經是世界上最大的汽車市場、最大的住房市場、最大的電信市場和最多互聯網用戶市場（4.79 億人），中國當局似乎不應該擔心另一個「六四」週年。但是，事實顯然並非如此，藝術家艾未未和其他一些最備受關注的維權律師受到非法而殘酷的綁架，清楚顯示中國目前正在對眾多異議人士實施嚴厲的壓制。對於這光天化日的公然綁架，所謂的「民主」西方政府卻只有很微弱的抗議，而在軟弱無力地談論「人權」之前很久，他們已經與中國專制當局有著諸多商業聯繫。

人權律師們「被失蹤」而又間歇性地得到釋放，但當他們出奇地再次露面時，已經不能再暢所欲言。這是另一種形式的有系統的恐嚇，當局希望以此來扼制和控制異議的聲音。同樣，記者和博客寫手受到選擇性的恐嚇。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中國自 1989 年 6 月大規模無選擇的屠殺以來確實實現了「某種發展」。一個更複雜的也更險惡的警察國家已經出現，它裝備著由美國和其他所謂「民主的」資本主義發達國家所發展出來的的最新高科技設備；而那些國家同時在經濟利益上與中國當局有著緊密的而又千絲萬縷的聯繫。

2011 年的鎮壓被國際特赦稱為「寒蟬效應」，這是自 1989 年以來最嚴重的打壓，並帶來諸多直接後果。但是，這遠不是一種實力的標誌，而只是表明了專制當局的不安全感。從 2008 年奧運會和西藏動亂以來鎮壓日益增加，在今年甚至變得更加明顯，因為當局擔心「阿拉伯流感」——發生試圖仿效阿拉伯世界革命的抗議活動。革命的衝擊至少橫掃北非和中東 15 個國家，二個獨裁者被推翻，並威脅到更多的獨裁者，對世界政治產生巨大而深遠的影響。西班牙和美國威斯康辛州發生的群眾抗議運動在很大程度上特別受到了埃及和突尼斯群眾鬥爭的嚴重影響。

中國的改變即將到來了嗎？

中共政權並非狂妄自大到一個地步，因蒙蔽於其顯著的經濟成就而無視警告信號。美國支持的獨裁者穆巴拉克總統深受群眾痛恨，其統治下也實現連續數年強勁的 GDP 增長，每年經濟增長率達到百分之七左右。但這沒有使埃及人民愛戴穆巴拉克軍事警察控制下的政權。國家經濟增長的成果一直以來為一小撮資產階級精英及政府的高級軍政官員所「騎劫」——政府官僚們正式控制埃及全國幾乎一半的經濟。絕大多數的埃及人仍深陷在貧困之中，需要為爭取生存而鬥爭以反對腐敗、通貨膨脹以及年輕人和大學畢業生嚴重缺乏就業。

不管經濟成就的光澤有多麼閃亮，中國所面臨的問題並沒有什麼不同，而且當局也深知這一點。中國的貧富差距比埃及、突尼斯和幾乎所有其他中東目前正在發生人民起義的國家都嚴重；用中國政府自己的話來說，就是「嚴重威脅到社會穩定」。中國 13.7 億人中的半數生活在農村地區，但他們只擁有全國財富的 12%。世界銀行說，大約有 5 億中國人每天的生活費不到 2 美元。而在社會的另一端，有極少數人正不斷變得非常富有。中國去年消費了全世界 27.5% 的奢侈品，總額達到 100 億美元。2010 年豪華車的銷售增長了 6 倍。

在這種情況下，出現類似中東的社會爆炸性事件的風險，並將之與 1989 年發生的事件相比較，不是什麼遠離現實的幻想。在「經濟奇蹟」的表面之下，經濟矛盾正日益積累，這也預示了一個可能的災難性變化。

越來越多的資本主義經濟評論家們警告說，中國經濟擴張由如類固醇興奮劑一般的信貸驅動，是難以為繼的。騎士資本集團戰略研究部門負責人馬克·拉帕羅 (Mark Lapolla) 曾經在 2007 年預測到美國金融市場的崩潰，他指出，中國經濟的態勢與 1929 年大蕭條開始之前的美國經濟異乎尋常的相似。他列舉了幾個關鍵的相似之處，包括嚴重的貧富差距，快速的工業化和勞動力轉移，經濟和金融數據的不透明和誤導性，新興階層大規模累結的債務槓桿，住宅房地產和固定資產/基礎設施都存在嚴重泡沫。

「從本質上講，由於當局本身急切希望利用經濟快速增長以安撫群眾，所以中國出現強烈的通脹，並因此造成廣泛的社會動盪而威脅到它自身。但如果它扼制投機和限制信貸，同樣會出現通貨緊縮崩潰的風險，這也將威脅社會和諧。其結果是中國不再能控制自己的命運，而自由市場會。」[《商業旁觀者》引述馬克-拉帕羅 (Mark Lapolla)，2011 年 5 月 24 日]

1989 年的教訓

既然坊間（尤其是在海外地區）存在豐富的記敘和分析 1989 年群眾民主運動的材料，為什麼這本由我們社會主義者撰寫的小冊子仍然如此重要呢？首先，它包含了非常寶貴的來自史提芬·祖利 (Stephen Jolly) 的第一手目擊資料。史提芬·祖利在運動的高潮階段曾經身處北京，親身經歷了 6 月 3 日到 4 日的恐怖鎮壓，並曾經代表工人國際委員會 (CWI) 與中國的青年和工人進行討論。其次，因為這是少數從社會主義的觀點分析 1989 年運動的作品，既反對史達林主義/毛主義也反對資本主義，並強調了工人階級在這一動盪的革命中往往被低估的作用。而工人階級的力量被諸多關於 1989 年運動的歷史記敘所斷然否認或忽視，1989 年當時中國正站在革命的大門邊緣，與今天在埃及、突尼斯和整個中東所發生的事件具有諸多類似之處。

社會主義者並不否認學生的作用，在許多情況下他們確實表現出英雄主義和勇氣。但是，我們要強調任何政治運動不能僅基於學生。1989 年中國的實際情況也並非如此，而許多評論家和歷史學家得出了錯誤的結論。社會主義者需要指出，儘管 1989 年許多學生領袖對此持懷疑的態度，但是工人階級是每一個現代社會實現革命性變化的主要力量。這來源於工人階級的經濟角色和其日常經驗，這些塑造了其政治觀點並使之準備領導為實現社會主義社會而進行的鬥爭。

中國的工人，特別是北京的工人階級，在 1989 年 5 月末和六月初戒嚴的關鍵時刻，成為了這場運動的無名英雄。據估計，超過五十萬或更多的北京工廠工人、學生、家庭主婦、辦公室工人、公務員和其他民眾夜復一夜地進行動員，形成強大的「人牆」，擋住了坦克和全副武裝的士兵向青年所佔領的天安門廣場的進發。

在這個鬥爭最後的關鍵階段，鄧小平專制當局無情地用部隊鎮壓了群眾抗議，但也遇到了諸如大規模的領導層分裂和背叛的問題，當時中國出現了權力分散失衡的局面。工人們開始組織自己的獨立工會，並開始討論籌劃進行總罷工。在首都北京，部分青年開始討論需要武裝自己以捍衛鬥爭反對反動力量。並且，他們嘗試將軍隊贏得到人民一邊，還取得了部分進展——當時雲集北京市內的 20 萬軍隊事實上只有少數的部隊真正用於包圍天安門廣場就表明了這一

點。

正如我們的小冊子所解釋的，和當時工人國際委員會（CWI）在其分析中指出的，這些事件的悲劇是在於當時群眾性反對史達林運動中不存在以實現真正民主社會主義為目標的政黨和綱領，只有它們才可能指明一條前進的道路。

在決定命運的最後的日子到來時，學生領袖的政治局限性則表現得越來越明顯。運動突破了學生領袖曾設想的僅僅是「抗議」運動的局限，並對執政黨和國家官僚集團構成了革命威脅。但這場革命缺乏革命綱領、政黨和一個具有清晰意識的領導層，因此其遭到挫敗並帶來了悲劇性的後果。

這不僅僅意味著鎮壓帶來的慘重傷害與損失（這在中國仍然是「國家機密」），而且是因為鎮壓的勝利使得鄧小平一派的政治力量能夠在沒有反對的情況下，壓倒一切地推行其親資本主義的「改革」——掠奪國有資產。這使「太子黨」得以暴富，在使他們自己轉變成為資本主義工業和金融巨頭的同時，仍然保持一個專制國家體制。這個過程在1980年代還只是處於初期，而這也成為了觸發1989年運動的原因之一。與今天太子黨們強大的力量相比，當時的太子黨們仍然只是新手而已，他們在北京所發生的群眾性示威中已經遭到了普遍性的攻擊與指責。

隨著對運動的血腥鎮壓，群眾運動的幽靈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遭到了驅除。在1990到1991年間官僚國家機器暫時中斷資本主義復辟的過程，在恢復元氣後得以繼續推動。當時北京當局重新加強了其內部統治和在國際上重新定位自己，他們吸取了俄羅斯和東歐其他史達林官僚主義計劃經濟體崩潰的教訓。

隨著史達林主義政權的崩潰，資產階級發動輿論宣稱「社會主義已經失敗」，令全世界工人階級的組織和鬥爭力量迷失方向、陷入困境，中共政權從此政治混淆獲益非淺。正如這本小冊子所解釋的，這些獨裁專制政權從來就不是社會主義，雖然他們建基於國有經濟之上，而不是資本主義經濟體。這是一個關鍵性的區別，使得這些社會具有比任何資本主義經濟體進行更均衡、迅速和平等的方式進行發展的潛力；但這只有在廢除官僚控制和設置真正的民主規劃和管理的社會主義制度條件下才可能實現。然而不幸的是，這並沒有發生，反而是徒勞無功的官僚體制的運作則得到了延續並耗盡了計劃經濟的所有活力，從而使這些社會陷入到經濟衰退與危機之中。

香港未敢忘記

1989年的運動包含著對於今天反對獨裁專制鬥爭的重要教訓。這適用於中國、香港及全世界。近年來香港一年一度的6月4日燭光晚會已經起到了不同的作用，隨著參與者數量的增長，意味著其得到新一代的補充。2009年20週年之際人數激增，估計有20萬人到場；而2010年甚至可能超過這一數字。當年大約有三分之一的參與者是1989年以後出生的青少年。此外，重要的是有成千上萬的內地群眾跨過邊境參與紀念活動。在密集的人群中，香港的一家報紙甚至採訪到一位來自廣東省的休班警員。他表示說，他參加這一紀念活動並不孤單，其他同事也決定參加。

近年來創記錄的參與人數具有重大政治意義。儘管多年來，一些香港的泛民主派嘗試使這項活動去政治化，試圖使之與1989年革命傳統和繼續鬥爭的需要實現脫鉤。而這正好與2010年以來香港泛民主運動的分裂相契合，有部分公開妥協的一翼泛民主派試圖與專制當局實現媾和，而另外一些力量則正確地拒絕這一路線。

毫無疑問，2010年之所以出現大規模群眾參與紀念活動的原因之一，就是「五區公投」所引發的一系列事件，以及腐朽的政改方案得以通過，延續港英時代非選舉產生官僚集團統治。5月16日出現了50萬張反對政府的選票，雖然曾蔭權政府將之貶為「低投票率」，但這標誌著年輕一代的激進化，此後有成千上萬的青年湧入維多利亞公園以紀念「六四」。

資本主義和民主

這本小冊子的一個中心目標就是揭穿資本主義支持中國和香港民主的神話。正如文森特-科洛所解釋：「今天，中國有著更多的資本主義，但與1989年相比則民主少了很多。」[本書《天安門和工人階級》一章節]

與得出這一論點的2009年相比，今天這一點變得更為清楚。現在中國正在進入了一個新的國家鎮壓的「黑暗時代」。一系列事件也證實了如美國、英國和其他歐盟國家等諸多帝國主義資本主義國家所秉持的反民主立場。埃及、也門和整個阿拉伯世界發生的革命所針對的令人仇恨的專制政權，它們幾乎都得到了美國外交政策的支持、武裝和保護。

埃及獨裁者穆巴拉克屠殺了800多名抗議者——在他的統治在二月解體之前，他試圖製造一個自己的「天安門事件」。然而就在他被推翻的幾天前，穆巴拉克被英國前首相托尼-布莱爾用最光彩辭藻稱為「一支非常勇敢和代表善的力量」。埃及的軍隊是穆巴拉克的權力基礎，並繼續威脅群眾的革命。穆巴拉克政權每年從華盛頓收到13億美元的援助，是美國在世界範圍內第二大受援國。同樣地，兇殘的也門總統阿裡-阿卜杜拉-薩利赫 (Ali Abdullah Saleh) 為了粉碎革命已造成數百名群眾的死亡，而其中關鍵的事實也是越來越令人尷尬，因為也門當局是美帝國主義的盟友。

這些事實清楚地顯示諸如「人權」之類抽象的概念是無法與資本主義領導人們重視石油、經濟實力和軍事影響力之類有形資產相競爭的。當涉及到保護其權力和經濟利益之時，所謂「民主的」美國和專制的中國有著類似的行事方式。

美國的虛偽

這沒有什麼新鮮的。由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所撰寫的新書《關於中國》引起了憤怒的評論，《星期日泰晤士報》因之無視侵犯人權和1989年天安門大屠殺而稱之為所謂的「令人心寒的騎士」。基辛格在結束政治生涯後通過安排美國的公司領導與中國政府官員之間的會面而建立起利潤豐厚的業務，他不過僅僅是一個誠實的美國資本主義制度的代表——也許是因為他不再需要尋求任何公職。

在1989年大屠殺後，儘管老布希政府和其他西方政府對在北京大屠殺中的死難者撒了幾滴用來公開展示的鱷魚的眼淚，美國很快就表明它願意與鄧小平和大屠殺後的政府進行繼續合作。詹姆斯-曼恩 (James Mann) 在他的優秀著作《中國幻想——為什麼資本主義不會給中國帶來民主》解釋說：

「雖然老布希曾公開宣佈凍結美國和中國官員高層接觸，但他在1989年7月和五個月後兩次偷偷派遣 [國家安全顧問布倫特 (Brent)] 斯諾庫勞菲特 (Snowcroft) 前往北京與鄧小平會談。當訪問遭到外界批評後，布希解釋說，他並不想孤立中國。他想要實現一個與中國「全面接觸的政策」。這一詞匯的選擇令人吃驚，因為列根政府曾在幾年前使用「長期建設性接觸」以描述其處理與南非種族隔離政府的政策。

這顯示了所謂的「民主」資本主義強國及其外交政策的虛偽性，無論是在中東還是面對中國都是如此。即使1989年大屠殺後，歐盟對中國實行的武器禁運在實踐中也可以廣泛規避，而且可能很快也要進行重新審查。因為中國政府大量購買處於危機中的歐洲國家西班牙、希臘、葡萄牙和愛爾蘭等國的主權債務，這進一步提升了歐洲資本家希望解除武器禁運並增強其貿易盈利的願望。

支持鬥爭，支持社會主義！

我們之所以重新發行這本小冊子是希望將 1989 年真正的教訓與新一代左翼青年、工人和民主活動分子聯繫起來。這些一直被官方的審查制度所掩蓋，同時那些「溫和派」泛民主力量也一直排斥或忽視工人階級的作用，並拒絕將 1989 年運動視為革命鬥爭。他們通過這樣做而錯誤地轉述了這些史詩般的事件。

在以上的章節中，我們試圖總結運動的主要經驗教訓，不僅是歷史的回顧，而且是作為今後中國和世界各地即將發生的社會和政治爆炸的指導。在本書《震驚世界的七週》2009 年第一次發佈的時候，有數千份電子版本秘密地散發到中國大陸。我們從大陸讀者處收到了許多積極的回覆。其中有一條簡短的回復給與我們以極大的鼓舞：「1989 年時，我是天安門廣場上的一個絕食者。今天，我已經 40 歲了。我支持你們！」

抵抗，香港社會主義行動
2011 年 5 月



如果你想要討論本文中多所提及的想法或瞭解更多關於中國、香港和國際範圍內社會主義鬥爭的情況，請聯絡

社會主義行動（工人國際委員會 CWI 香港的支持者）

電郵：socialist.hk@gmail.com

網址：www.chinaworker.info

前言

1989年天安門廣場上所發生的運動和由此導致的6月4日血腥大屠殺成為了中國歷史上一個關鍵的轉捩點。從某種意義上而言，它甚至也是世界歷史的一個轉捩點。從4月中旬直到6月初，在七周的時間內全中國數以百萬計的群眾走上街頭。在天安門運動被鎮壓6個月之後，東歐的史達林主義一黨專制政權紛紛土崩瓦解，1991年8月曾經不可一世的蘇聯也徹底垮臺。

自由主義者和資產階級理論家們由此聲稱資本主義制度和市場經濟是遠勝於所謂的「社會主義」和計劃經濟的經濟制度。但這一論斷如今卻由於資本主義經濟危機而變得不堪一擊，50萬億美元的金融資產一年之內蕩然無存，這約相當於10個中國的GDP總額。一些評論家甚至將之稱為新自由主義的市場經濟的「柏林牆倒塌」。每個月有數以百萬計的就業機會正被摧毀，不僅是在中國，在全世界範圍內，數百萬人重歸絕對貧困。

史達林主義的崩潰使資本主義制度獲得了巨大的宣傳勝利——「社會主義已經死亡」——它們在全世界範圍內攻擊已經迷失了方向的勞工運動。它同時還拆除了民族和國家的屏障，使資本可以肆無忌憚地剝削東歐、俄羅斯、中國、印度以及其他所謂發展中國家。但是，斯大林主義，即由不承擔任何責任的官僚精英控制非資本主義的國有經濟，並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真正的社會主義需要工人階級和其他勞動者自己組建的民主機構——包括選舉產生的工人委員會、工廠委員會、農民委員會和其他基層群眾控制的工會。正如偉大的革命家托洛茨基所說明的，在官僚主義的控制之下，計劃經濟將不可避免地窒息和枯萎；由工人階級對於計劃經濟不間斷地進行民主控制、檢查和調整是至關重要的，這正如「氧氣對於人一樣重要」。這一根本性的缺陷——缺乏工人民主——足以解釋史達林主義政權所面臨的經濟危機，而由於這一危機使得越來越多的前共產主義領導人轉向資本主義立場。

在中國，這些矛盾，也包括史達林主義的國際性危機，都融入到了1989年所發生的事件中。這場群眾運動，最初起始於對民主的模糊訴求，並在一定程度上包含有對於西方資本主義制度的幻想，這一幻想是由自由主義知識份子和親資本主義中共當局內部的右翼執政官僚（趙紫陽派）所引起的，但之後整場運動發展成為對於中共專制統治的挑戰。運動很快就超越了學生抗議運動的範疇，並開始影響到廣泛的不同階層——尤為關鍵的是影響到工人階級。這對於資本主義「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而言是個明確的信號，必須採用暴力血腥的手段徹底粉碎運動從而恐嚇工人、學生、以及其他階層以免他們在未來跨越「界限」。

本書由社會主義行動的網站製作以對這一系列事件在中國和世界範圍內的發展和影響作出獨立的分析。此外，這也是第一次用中文發佈斯蒂芬·喬利（Stephen Jolly）在天安門事件期間的親身經歷。斯蒂芬·喬利是澳大利亞大墨爾本區亞拉市的第一位托洛茨基主義市議員，27歲時曾作為工人國際委員會（CWI）的代表來到中國親身經歷了天安門事件。作為一名外國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受到了中國學生和工人的熱烈歡迎，並與他們一起討論了運動前進的方向。《見證中國——天安門事件》一文是根據斯蒂芬·喬利1989年7月在倫敦舉行的一次演講整理而成的，共有500多名青年社會主義者和工人國際委員會（CWI）的支持者參與那次天安門事件的研討。本書冊中也包括有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的編輯文森特·科洛（Vincent Kolo）和陳墨合作的一篇對1989年運動分析的新作。

本書試圖總結出以下重要教訓：1989年的天安門運動是否能夠成功地改變中國，如果能夠的話，應該以什麼樣的政治綱領為基礎？當時所發生的群眾運動是否是企圖恢復資本主義制度，因此是否當局的鎮壓是在「捍衛」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大屠殺和之後的鎮壓使哪些階層獲益，又使哪些階層受損？工人階級在運動中到底發揮了什麼作用？瞭解這些問題的答案將有助於我們理解在未來中國會發生些什麼；工人階級組織和反抗超額剝削的前景，以及如何才能通過新的大規模群眾運動實現真正的民主和真正的社會主義。

天安門事件：震驚世界的七周

1989年4月15日，前中國共產黨總書記胡耀邦因心臟病發作去世。由此觸發了一場人類現代史上最大規模的群眾運動之一的天安門事件。這場運動的發展很快就超越了其最初發起者的期望，並幾乎推翻了所謂「共產主義」的專制政權。

4月17日，第一批抗議人群，約700名學生和教師，從15公里外的大學校園步行到北京市中心的天安門廣場。他們高喊「胡耀邦萬歲！民主萬歲！打倒腐敗！打倒獨裁！」的口號。在接下來的幾個星期內，這些口號帶來的迴響將傳遍世界各地。

數以百萬計的群眾前赴後繼地加入到了北京示威活動中，抗議政府的示威蔓延到全國110多個城市。整場運動從開始直到血腥鎮壓結束之時，示威者一直高唱「國際歌」，而當局的謊言卻將這場運動稱為是一場「資產階級反革命暴亂」。僅僅在第一次小規模遊行的5天之後，胡耀邦葬禮的當天，20萬人不顧政府禁令佔據了天安門廣場。在北京20多所大專院校發生「學生罷課」，之後一個稱為「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高自聯）的組織宣佈成立以協調不同學校學生間的行動。截至5月中旬，產業工人也開始組織起來和並為發展獨立工會運動奠定了初步的基礎。所有上述事件的發展使當時的中共領導人感到恐懼，他們深怕出現一場「波蘭式的混亂」，並由此發展出一個獨立的大規模工人運動。

正如列昂·托洛茨基（Leon Trotsky）所說的，「一場革命就是當群眾開始直接對事件發展產生影響，並充分感知到他們進行這種影響的力量。」而這正是對當時中國局勢的概括。此時，因為「將資本主義制度重新引入中國」而受到西方政府所讚賞的鄧小平當局，卻正如歷史學家莫里斯·邁斯納（Maurice Meisner）所描述的一樣，看起來，「似乎處於一片混亂和無能為力之中」。統治集團和軍方陷於深深的分裂中而無力應對。當時工人國際委員會（CWI）的英國支部機關報《戰鬥派》（Militant）對此描述，「…和平推翻官僚體系的所有條件都已存在…唯一缺少的卻是至關重要的部分：清晰的綱領、戰略和戰術。」[《戰鬥派》，1989年6月9日]

在1989年6月3日到4日的那個晚上，鄧小平和他在執政集團內的「強硬派」支持者終於趟著成千工人和青年的鮮血重新恢復了他們的統治。鄧小平動用了約20萬人民解放軍部隊對中國的首都進行「全面入侵」。而相比之下，美國2003年入侵伊拉克也不過使用了24.8萬軍隊。根據國際特赦組織的資料，在風暴中心的北京有至少1000人被殺害。在此之後幾周和幾個月內，有超過4萬人被員警搜捕，其中工人所遭受的痛苦甚至遠高於學生。任何在運動最後幾天曾經組織或者試圖組織罷工的工人都被判處長期監禁乃至被以「反革命分子」的名義處決。短命的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工自聯）呼籲進行總罷工以迫使當局停止軍事屠殺，而其活動參與者都被指控策劃武裝起義和反對政府，所有人員都遭到通緝與追捕。

閱讀本文的讀者應該清晰地認知到所有關於「天安門事件」的資料都被當局認為是「煽動性的宣傳」而加以掩蓋。對政府而言這正如「卡夫卡恐怖」一樣，20年來全面禁止任何關於「64」的新聞與報導。而與此同時，政府不停地重複著「天安門廣場沒有人死亡」，鄧小平是被迫採取行動以避免「社會動亂」和確保「安全繁榮」等諸如此類的謊言。1990年代和21世紀初的經濟迅速增長仿佛也為當年的屠殺提供了歷史性的辯護理由。

但事實正與當時中國當局一些領導人宣稱的相反，「鎮壓1989年群眾運動並未能防止中國重返資本主義。」中共領導人繼續追尋越來越多的新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政策並同時進一步強化專制鎮壓。那些聲稱市場經濟（資本主義）和民主制度是形影不離的雙胞兄弟的人士很難解釋目前中國所發生的一切——即「中國模式」為什麼對於資本主義跨國公司而言如此流行。

今天，20 世紀 80 年代一直被描述為相對開放和言論自由的「黃金時代」，但正如「天安門母親運動」在一份請願書中所描述的（該組織成員包括在 6 月 3 日到 6 月 4 日當晚被軍方殺死的眾多平民的父母、親戚和朋友），「當時中國已經成為一個密閉的鐵房子」。今年是具有特別重要意義的「六四」22 周年，而且又恰逢災難性的全球資本主義危機，中共當局處於全面緊張之中。當然在中國內地，當局根本不可能容忍類似的抗議活動。而且目前當局已經開始加強所謂的「安全」措施以鎮壓「泛民主派」分子和任何敢於公開批評政府的左翼和社會主義力量。

綜上所述，如今至關重要的是要充分吸取「64」運動的真正的教訓，將其從覆蓋於上的迷霧重重的歪曲、謊言和誤解中挽救出來，並通過新一代人的討論和研究尋找到能真正改變社會政治和經濟制度的道路。

1989 年群眾運動的起源

北京的學運活動分子計畫在 1919 年的「五四」運動 70 周年之際走上街頭進行抗議活動，並確保抗議活動能一直持續到當時蘇聯領導人戈巴契夫 5 月 15 日對中國的歷史性訪問。當時戈巴契夫被普遍視為「共產主義政黨」（事實上是史達林主義）集團中的「民主派」。學生有大量的不滿，但核心問題是擔心他們認為本應該跟隨「市場改革」一起發展的「民主化」進程在中國發生倒退，而當時戈巴契夫統治下的前蘇聯和東歐地區這一進程仍然在蓬勃發展。而胡耀邦逝世的新聞促使學運活動分子根據傳統「借悼念死者而譴責活人」的方式進一步加快推進他們的計畫。

胡耀邦作為中共黨的領導人于 1987 年被迫下臺。起因在於他處理 1986 年 12 月在北京和上海所發生的學生民主運動時過於「軟弱」。官僚集團內部的「強硬派」擔心由於胡耀邦的「軟弱」而導致政治不穩定和來自於群眾對執政當局的挑戰故而迫使「最高領導人」鄧小平犧牲其盟友。胡耀邦是鄧小平自 1978 年開始推進親資本主義「改革開放」政策的先鋒。但是他的解職並不意味著政策發生決定性的變化。胡耀邦的繼任者趙紫陽是一個更加公開親資本主義「改革者」。不過胡耀邦的失勢加劇了泛民主派陣營和激進學生的擔憂，他們擔心因此「政治體制改革」將被就此擱置。從而他們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必須採取某種行動」以使得天平的指標重新擺回到有利於他們的一端。胡耀邦在許多方面都類似於前斯洛伐克領導人杜布切克，他認為「社會主義應該具有人道主義的特徵」，杜布切克於 1968 年蘇聯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時被推翻。胡曾經認為中國應從西藏撤出軍隊。他曾在 1984 年聲稱「馬克思和列寧無法解決我們今天面臨的問題」而引起了「強硬派」的眾怒。



與此同時，政府激進的市場政策徹底改變了當時的中國社會，在社會諸多領域出現混亂，警示不斷。西藏爆發了 30 年來最嚴重的暴亂和街頭抗議。這一抗議運動被當時的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胡錦濤以極為無情的方式鎮壓下去，而此後同樣的暴力鎮壓也被用於北京所發生的民主運動。1988 年中國通貨膨脹率達到 31%，是 1949 年革命以來的最高水準。由於當局的經濟緊縮措施，1989 年全國超過 100 萬家企業被迫關閉。在 4 月 22 日，胡耀邦的葬禮日，西安和長沙失業的青年和工人與員警發生衝突。

整整一年時間裡，政府的高層內部因困於價格改革的辯論而敵意日深。最初為鄧小平所支援的趙紫陽希望能全力推動價格自由並徹底放開市場。在當時的中國，經濟上存在著一套「價格雙軌制」體系，即同一商品同時存在著計畫體系內國家規定的價格和自由的市場價格。這為一部分官僚提供了可以上下其手的絕佳致富機會，他們將國家計畫體系內的貨物通過各種手段拿到市場上銷售以趁機漁利。正如中國「新左派」代表人物學者汪暉所指出的：「僅 1988 年一年，由於「價格雙軌制」的存在（為官僚提供「尋租」機會），兩種價格間的差額達到 3570 億元人民幣，相當於當時一年國民收入的 30%。」[汪暉，《中國的新秩序》，2006 年]

趙紫陽提議進一步推進價格改革以徹底消滅利用「雙軌制」產生的價格差投機，但在現實中，這會導致物價進一步上升加劇工人和底層群眾的生活負擔。上層的政治僵局反映了群眾的壓力，導致價格改革的停滯。但僅僅在 6 月 4 日大屠殺 3 個月之後，這一價格改革計畫就得以推行，因為來自群眾抗議的威脅已經被徹底「解除」了。

史達林主義的危機

澳大利亞的托洛茨基主義者，當時年僅 27 歲的斯蒂芬·喬利 (Stephen Jolly) 正身處北京，在他激動人心的第一手資料中描述道，「我當時覺得我處在整個世界的中心」。很明顯，當時中國發生的這場鬥爭的後果會在國際範圍內產生巨大的影響，就如同今天在我們身邊所發生的資本主義工業危機和金融危機所發生的影響一樣。汪暉認為，「當年在北京所發生的事件引發了蘇聯和東歐的解體，並促使新自由主義在政治和經濟構架上得以全面主宰世界。」

中國工人與青年所表現出的英雄氣概和之後隨之而來的殘酷鎮壓無疑加速並加劇蘇聯和其他東歐史達林主義一黨專政國家的統治危機。事實上這些社會早已在危機中搖搖欲墜。基於中央計畫和國家所有的經濟方式所帶來的巨大優勢使它們在建國初期迅速實現了工業化，但此後由於官僚國家體制所帶來的窒息使經濟處於全面停滯之中。假如不實現真正的社會主義，也即是由工人階級積極民主地介入到社會和經濟的整體運行中，那麼這一後果是不可避免的。

隨著經濟危機的日益加劇，史達林主義政權殘酷鎮壓的本性日益彰顯，官僚體制對於工人權利和社會保障體系的逐步損害，群眾中的某些階層產生了對於被這些政權用來進行統治的「社會主義」的名義日漸反感。而這一情緒尤其突出表現在知識份子和官僚階層本身的身上。中國由於 1966-1976 年所謂的「文化大革命」帶來的混亂後果，特別是「知識份子」階層被毛派宣傳作為「壞分子」，而使知識份子中的相當部分人變得特別敵視「共產主義」。

在整個史達林主義世界中，以中國、匈牙利和南斯拉夫為首，部分史達林主義政權的官僚開始寄希望於資本主義制度作為維護其自身權力和特權的生命線。在擊敗毛派「四人幫」之後，鄧小平於 1978 年掌握政權並在中國開始了一個決定性的轉折；雖然當時並沒有恢復資本主義制度的完整計畫，最初只是試圖在官僚計畫經濟中「務實地」結合一些資本主義經濟的特徵——如給予管理層「獎勵」，減少對工人的保護，對私人財富和投資更為開放等。但是在 20 世紀 80 年代，具有更明確意識的親資本主義的政治力量在中共政權內部開始逐步浮現，而鄧小平和趙紫陽就是其中的關鍵人物。

在上世紀 80 年代，這一自上而下進行的經濟變化所造成的的結果是巨大的。首先，所有的農業生產在 1979 年至 1983 年已經私有化，並非如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所主張的那樣民主化改造人民公社而是徹底地取消人民公社。這

為今後農村地區醫療和教育資金嚴重不足創造了一個巨大的「黑洞」（因為過去這些服務的資金一直依賴於人民公社的共同的積累）。同時政府還推出了「沿海地區開放戰略」，將更大的權力移讓給東部沿海省份並鼓勵它們融入世界市場，特別是通過海外華人的投資得以發展。而且以資本主義方式運行的「特區」也在不同的幾個地區得以建立，並隨後擴展到更大的範圍。其他「改革」措施還影響了職工就業安全和國有企業工人的福利，同時通過宣傳社會中的不平等現象而稱讚物質刺激，並指責國有企業的工人過於「嬌慣」。同時在 1986 年通過了一項新的勞動合同從而廢除國有企業的終身雇傭制度。這些變化本身還並不等於恢復資本主義制度，但毫無疑問是對計劃經濟的大量侵蝕和損害工人階級的地位。

毛派作家李民琪，其本人曾經參與 1989 年運動（儘管他承認他在 1980 年代當時還是傾向於『新自由主義民主派』）描述了從 1985 年之後所發生的一切：

「官方的電視節目、報紙和雜誌積極描繪西方資本主義的高度繁榮和東亞資本主義『四小龍』所表現出來的活力。似乎只有中國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已經被落在後面，…資本主義從一個進行超額剝削的血汗工廠的代名詞變為民主、高工資、高福利以及工會保護工人的權利的同義詞。而事實上直到 20 世紀 90 年代，中國工人階級才能根據自身的經驗感受到資本主義對於現實生活到底意味什麼？」[李民琪，《中國的崛起和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消亡》，2008]。

該如何定義 1989 年運動？

今天由於當局對資訊自由和討論的封鎖，所以對於天安門事件本身有很大的誤解和混淆。中共政權的一些辯護士仍然將 1989 年事件視作一場「顏色革命」，並將它歸類於與 2003 年格魯吉亞和 2004 年烏克蘭所發生的一切一樣。直到今天他們仍然希望將運動描繪為親西方資本主義的，而抗議者不過是外國帝國主義在前臺的「木偶」。這一想法也為中國的新毛派運動中的某些人所接納，而這主要是基於當初 1989 年運動中某些領導人今天的立場，而不是這些人在當時的所作所為。重要的是如今一些毛派青年已經開始擯棄這樣的思想，並將 1989 年事件開始看作是真正的「人民運動」。這是值得歡迎的一大步。

正如眾多的群眾運動一樣，天安門廣場的群眾運動是極其複雜和多樣的。這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在一黨專政和而且缺乏獨立的工人階級和其他被壓迫層的政治組織。由於長期的處於專制統治的黑暗之下，所以這場運動的組成就猶如「政治彩虹」一樣充滿各種政治譜系。最初 1989 年運動中的某些力量對於西方式的資產階級民主抱有幻想，甚至傾心於「臺灣模式」，這雖然是在整場運動中具有影響力的思潮，但絕非是具有決定性意義的。其他一些人則寄望於「重新構造的社會主義」，並在思想上靠攏戈巴契夫。但主要是在工人中，已經存在了反對「改革開放」和捍衛 1949 年革命最重要成果國有資產的想法。在各種思潮中的唯一共同點是對於現政權的日益不滿，但至於以何種方式取而代之卻絲毫沒有清晰的概念。

毫無疑問運動最初發軔於知識份子和他們在學生中支持者，也就是今天所稱呼的「新自由主義者」（但在當時這個概念還沒有被使用）。在黨內他們接近趙紫陽一派力量，他們的政治觀點不僅捍衛公民的基本自由權利、新聞自由和集會自由（這些也是我們也完全支持的目標）；而且在不同程度上，支持資本主義的「自由市場」制度。但這些人在當時的表達並不如之後他們所做的那樣直白。不少學生運動的領袖並不想推翻政府，而只是希望能幫助以趙紫陽為首的親資本主義一翼控制局面。而這一路線也為他們的一個中心訴求所證實：支持（實際上毫無力量的）全國人大召開臨時會議對官僚進行質詢乃至改選，並使「強硬派」力量從政府中消失。正如當時的學生領袖吾爾開希所回憶的，「我們當時的目的就是要政府聽見我們的聲音並與我們對話，這是唯一的真正目的。」

但是，一旦心理障礙被打破——人們就自然會走上街道勇於公開面對獨裁——學生的抗議活動就像是一塊巨大的磁鐵吸引了社會中所有積累的不滿情緒。這樣抗議運動的閘門被打開了，雖然這些社會力量與學生領袖之間沒有充分共用的利益和目標。即使在學生中，也存在著相對年齡較大的更為親趙紫陽的階層和另外一個年輕的更激進的大多數人群，他們將趙看作為與其他中央官員根本沒有什麼不同，這反映在群眾中對於「太子黨」的稱呼，——高級官員的兒女通過利用關係進行發財致富變成或正在變成資本家。而就連鄧小平和趙紫陽的後代都是臭名昭著的「太子黨」，並遭到數百萬示威者的譴責。如當時的一個順口溜：「毛澤東的兒子上前線，林彪的兒子搞政變，鄧小平的兒子做捐獻，趙紫陽的兒子倒彩電。」

毛澤東主義對於這場群眾性運動也同時具有重要而又引起相當爭議的影響。在北京以外的不少地區，尤其是在一些工業城市，群眾舉著毛的畫像或佩戴他的徽章走上街頭，以所謂毛時代「極為清貧」的官僚的生活方式與當時鄧小平當局官僚們如百萬富翁般奢侈的生活方式作為對比。而在北京這種現象並不多見，多數學生對於毛的影響抱有警惕與成見，認為他遠比其繼承人（鄧小平）更為獨裁。但即使在北京，學生于 5 月 12 日所發起的絕食抗議及採用的口號也多可見到「文化大革命」的影子或索性是它的複製品。而且某些當時的學運領導人事後甚至認為採用「絕食抗議」的方式過於激進。然而「絕食抗議」本身卻成為運動中一個關鍵的轉捩點，在「絕食抗議」的進程中，其他階層，尤其是工人階級，「跨過藩籬」毅然加入到了運動中。

廣泛的各階層群眾介入使運動改變了性質並使之推向另一個方向：從支持和尋求獲得某一派官僚支持的抗議運動日益轉變成為一個公開挑戰整個官僚體系的運動。而且就當時而言，天安門運動是整個史達林主義陣營中表現比較奇特的一個現象，——反資本主義，反「市場經濟改革」。正如汪暉在 2006 年接受《紐約時報》訪問時所提到的，而他本人也是 6 月 4 日最後一批離開天安門廣場的學生中的一員，這是一場「廣泛的社會運動」而且來源於「對於市場改革衝擊所帶來的痛苦」。

一場政治革命——仍然保留國有經濟的基本原則和其所帶來的關鍵社會進步，但同時使新的政治架構完全置於工人的民主控制與管理之下——在當時的中國幾乎是可能實現的目標。但問題是在於當時缺乏實現這一目標的至關重要的因素，也就是缺乏一個真正的、深深紮根于工人與學生中的、能在每一個關鍵的轉捩點從下而上地以清晰的綱領、戰術和口號去引導群眾運動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只有這樣的力量才能夠以明確覺悟地方式引導並非有明確自我意識的群眾運動實現真正的社會主義以取代資本主義和史達林主義。



天安門事件與工人階級

1989 群眾運動的一個重要特徵是在於它是一場以城市為基礎的群眾運動（幾乎不涉及農村地區），它也可被認為是自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以來的第一次真正的城市群眾運動。中國衰老的統治者們深刻理解和恐懼這樣的運動。毛澤東領導的 1949 年革命雖然消滅了資本主義制度並建立了國有計劃經濟的基礎，但這是一場以農村地區為基礎並由等級分明的史達林主義政黨領導的革命；在這場革命中城市中各階級，尤其是工人階級，沒有起到積極的作用。雖然毛主義——史達林主義的官僚聲稱「無產階級是整個社會的領導階級」，但是他們害怕這個階級潛在的巨大力量。當權力得到鞏固後，他們就開始系統地阻止獨立工人組織的發展。

即使在 1989 年的時候，中國龐大的農村人口占到總人口的 78%，為波拿巴政權提供了一個理想的基礎。波拿巴政權即是由一個「偉大舵手」掌控的專制統治。馬克思對農民角色的解析是：「他們無力代表自己，所以不得不由他人代表。他們的代表往往也就成為他們的主人，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威，一個不受任何限制的政府權利保護他們免受其他階級的打擊，並由上至下地給他們普施『陽光和雨露』。因此小農階層的政治影響最終是通過使社會服從於行政權力而得以表達的。」[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1852]

正是由於此原因，所以從馬克思開始所有真正的社會主義者都一直強調，工人階級的決定性作用，通過其階級本身的民主組織和群眾性社會主義政黨進行組織，並得以建立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社會。即使在中國這樣工人階級占少數的國家中，情況也應如此；當然他們必須得到貧苦農民和其他被壓迫階層的支持。中國也只有基於這一點才可以重塑其未來。1989年城市人口只有 1.7 億，占總人口的 17.9%。今天這一數字是 5.9 億，占總人口的 44.9%。

工人和學生

一開始學生們盡力阻止工人參加這一新的民主運動。示威的組織者被告知結成人鏈不要讓工人加入到遊行中。邁斯納評論道：「學生們中存有階級偏見（知識份子對於工人階級），他們多反對工人參加民主運動是因為他們認為工人沒紀律和有暴力傾向。如果工人參與運動就會給了政府使用武力的藉口…」[邁斯納，《毛澤東的中國及其後》，1999]

學生最初對待工人階級的冷漠態度反映了他們害怕工人，至少害怕他們潛在的影響力，會把運動引向不同的方向：反對市場改革。李民琪承認他那時的觀點是錯誤的，評論道：「在一方面，我們（學生）認為這些工人是消極的、順從的、無知的、懶惰的和愚昧的。然而他們現在都去支持我們。在另一方面，就在幾個星期以前，我們還狂熱地提倡關閉所有的國有工廠並使得工人們失業的改革計畫。」[李民琪，《中國的崛起和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滅亡》，2008]

學生們對工人的排斥源自於他們希望這場運動將作為杠杆去影響當局的權力鬥爭，有利于以趙紫陽為首的激進改革派（最傾向資本主義的派別）。因此，學生都盡最大努力不將工人階級納入活動。趙也跟政府中的其他派別一樣，要不惜一切代價防止這種情況發展。按照既定的計畫，是不應該出現革命性的群眾運動。當局態度傲慢的對學生做出威脅性的反應。學生不得不求助於更加大膽和挑釁的抗議方式，並得到了工人階級和其他各階層民眾巨大同情。最初是慢慢的，然後速度越來越快，反政府情緒充滿了工廠，車站，辦公室和工人社區。與此同時學生變得更加激進，他們和工人之間的壁壘消失了。

在 1989 年中國大學生還是傳統上的精英，但是隨著巨大的經濟變革，現在的情況發生了改變。二十一世紀以來大學入學人數增加了 6 倍，每三天就有一所大學正在建造（儘管常常沒有合格的教學人員）。在過去，擁有大學學位就意味著有了工作並至少可以在國家機構的底層任職。但現在不再是如此。今天的中國面臨著日益嚴重的大學畢業生大規模失業的問題。

獨立工會的復蘇

5月16日，據說是來自中國各省的群眾在當局控制的中華全國總工會總部門前舉行抗議。示威者要求建立獨立工會、給予罷工的權利和解雇總工會的官僚們。針對這種壓力，據報導，總工會的領導給了學生相當一筆捐贈。根據英國《衛報》的約翰·吉廷斯的一項調查表明，百分之七十的普通工人認為官方工會毫無用處或者和管理層勾結。為了對付工人中對於學生的抗議活動越來越多的同情，「政府發佈命令提供的現金獎勵給北京工廠的工人，要求他們遠離廣場。」[吉廷斯，《中國的變遷-從毛到市場》，2005年]

但是，隨著學生開始絕食，這一試圖孤立學生的策略失敗了。在5月17日的支持學生絕食的示威當中清楚表明了這點。正如約翰·吉廷斯所報導的，參加這次示威的包括了首鋼、燕山石化、首都醫院，西單商場、北京總工會、第一機床廠，管樂器廠，中國重型機器廠以及軍工企業和普通工人、人民銀行、北京電力公司、鐵道部和其他工廠。在這一階段已經由工人提出進行總罷工以支持學生運動，但學運領袖們反對這一建議；這是他們所犯的眾多嚴重錯誤中的一個。

正如吉廷斯指出工人大規模的動員「對當局來說是一個更明確的信號，表明當局已對群眾失去了控制。」第二天，5月18日，一群青年工人在廣場上宣佈成立了自己的自治工會。「我們向全國各地的工人宣佈：北京工人已經組織起來了，」他們威脅要發動為期一天的總罷工，除非學生的要求得到滿足[法德斯和希金斯，《天安門——北京暴行》，1989]。一個星期後，5月25日在天安門廣場成立了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

斯蒂芬·喬利作為工人國際委員會（CWI）的代表去了北京，其中重要的一點是他應邀會晤了新近成立北京工自聯的領導人。對海外托洛茨基主義者來說這確實是一種榮譽，聚集而來的工人們對他的敘述很感興趣，包括對世界各地發生的事件，在波蘭和其他地方的工人鬥爭，和工人國際委員（CWI）認為中國應該發展怎麼樣的群眾運動：「一旦這些工人領袖發現了我是誰和我在這裡要做什麼後，他們都十分興奮…比學生的反應還要好…」[斯蒂芬·喬利，《見證中國——天安門事件》，1989]

與斯蒂芬·利會晤後第二天，部分工人代表被捕，該組織被當局認定是一個非法的「反革命」武裝。這是一個最典型的奧威爾式巧言令色的例子。在大屠殺發生之前，被逮捕的是這些工人，而不是學生，反映了中共對於工人階級的恐懼。工自聯的綱領是很明確的，就是工人階級要獲得國有企業的控制權，以捍衛和延續1949年革命的成果。敏銳的中國問題專家約翰·吉廷斯解釋道：「它（新工會）特別有威脅性，因其明顯地帶有獨立的社會主義特征。」鎮壓1989年群眾運動是從禁止新工會開始的，所以說這次鎮壓與「保衛社會主義」扯不上任何關係。工自聯公開地要求要通過一切合法和有效的手段，去監督所有的國有和集體企業的法人代表，使得工人成為企業的真正主人。在其他（私人）企業中，將通過與企業主的協商和其他合法手段，使該組織能夠保衛工人的法定權利。[《國際勞工報告》，1989年7至10月]

戈巴契夫的訪問-熱度升高

5月15日戈巴契夫訪華，是蘇聯領導人30年來的首次訪華，這次訪問使中國領導人非常丟臉。原來歡迎戈巴契夫的計畫是安排在天安門廣場的，但當時這是不可能的。廣場上佈滿了絕食示威者的帳篷，用一個美國記者的話來說，廣場就像是一個「東方的伍德斯托克」。這次絕食抗議開始於5月13日，絕食者和全球一樣期待戈巴契夫的到來。這次行動無視員警，也不理會趙紫陽要求學生離開廣場的呼籲。中國和蘇聯官員被迫臨時把接待改在北京機場。連紅地毯都沒有了，戈巴契夫也沒有能夠發表他的「歷史性」的講話。蘇聯領導人的訪問標誌著一個決定性的轉捩點。正如莫里斯·邁斯納指出：「在那三天，民眾支持民主運動的熱情高漲——同時鄧小平也堅定了用軍隊鎮壓運動的決心…」[邁斯納，《毛澤東的中國及其後》，1999]。

參加要求政府對學生的要求做出讓步的絕食人數，一開始大約160人，但兩天內上升到超過三千人。這是一個非



常感人的策略。記者黃明珍指出：「當學生們開始絕食抗議，就使很多人感動到流淚。」天安門廣場上標語牌寫著：「媽媽，我們很餓，可是我們吃不下。」其他一些口號也反映了學生中混亂的意識和對改革而不是改變制度抱有幻想：「在莫斯科他們有戈巴契夫。在中國我們有誰？」和「我們也需要政治體制改革」。體制改革，這是戈爾巴喬夫的口號，沿著市場路線重建經濟體制，與趙紫陽和鄧小平的改革路線相似。套用毛澤東的話，這又是一起「外國的月亮更圓」——主要原因在於缺乏可靠的資訊。然而許多學生指出的一點是，戈巴契夫正在朝著更為民主自由的方向發展，而他的中國同行恰恰走向相反的方向。

絕食使中國整個社會都興奮起來。5月15日（當天戈巴契夫到達北京）有50萬人在北京進行遊行。5月17日，超過了100萬，這可能是自1949年以來規模最大的群眾集會。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參加遊行示威的人員對當局來說是一個不祥的信號。遊行隊伍中加入了數以十萬計的工廠工人、辦公室職員、教師、穿制服的員警，甚至還有1000名解放軍學員。標語包括：「你們的孩子在欺騙，我們的卻在挨餓」（說的是「太子黨」）和「救救學生」。

領導人會見學生

面對壓倒多數的群眾支持學生，政府被迫至少表示「同情」，並願意開始「對話」。5月18日，當天戈巴契夫離開了北京，5個政治局常委（中共最高政治機構）中的4個去醫院探望絕食的學生。持強硬立場的李鵬總理和趙紫陽都在電視攝像機前與住院的學生談話，企圖贏得公眾的支持。李同意與學生領袖在人民大會堂舉行電視會議。這是一個笨拙的會見。李試圖說服他的聽眾：「我的三個孩子都沒有參與牟取暴利，一個都沒有。他們的年紀都比你們大。我們看待你們就像是我們自己的孩子。」[法德斯和希金斯，《天安門——北京暴行》，1989]

如今李鵬無法再說出這樣的話。他和他的兒子已經在商業界非常出名，特別是三峽大壩的施工公司都深受他們的

影響。三峽大壩源自于李鵬的想法。著名的「新國大」期貨公司在1998年宣告破產時欠下超過4000個投資者的5億元。李的妻子、小兒子和兒媳都是該公司董事會成員。李鵬的兒子李曉勇用假名逃到香港，現在已經獲得新加坡長期居住身份，在那裡他的生活方式極其奢侈並從事房地產行業。另一個兒子，李曉鵬，是紐約上市的華能國際電力國際公司董事長。在2005年，河北省繩油村，該公司為了建設一個新的發電廠派出打手驅散數百名貧困農民，有6個農民被砍死。

在5月18日他最後與學生的對話當中，李鵬放棄一切偽裝並憤怒地告訴他們：「北京完全混亂。此外，混亂已蔓延到全國各地…我可以說，在過去的幾天裡，北京一直處於無政府狀態之中…我希望你們學生想一想在這樣的情況下會發生什麼樣的後果…我們不可能坐視不管的。我們是要保護學生的安全和生命的，要保護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這些話是對著電視攝像機說的，而並非是對著學生。第二天李鵬宣佈戒嚴令。這一決定既非保護「社會主義制度」也並沒有保護「學生的安全和生命」！

趙紫陽泡沫的破滅

趙紫陽被迫離開政壇和遭到多年軟禁，直到2005年死時，他都被廣泛地認為是一個支持學生反對鎮壓運動的一個領導。這在某種程度上是現實的改良版本。他試圖依靠這個運動去挫敗他的政府統治下的對手，這是真的。但試圖進行這種博弈被證明是他力所不及的。這歸根到底，並非在於不同領導的個人品質問題，而是他們所代表的路線以及當時的形勢發展所決定。問題是：為何大多數改革派或中國政權的親資本主義派選擇「秩序」而不是妥協？

那個時期，政府和官僚中的權貴都深受混亂的折磨。他們感覺正在失去對社會的掌握並漸漸地失去國家機器的控制。趙紫陽和鄧小平之間的鬥爭變得激烈。中國前國家主席李先念抱怨黨內有「兩個指揮部」，這種狀況就鼓勵了遊行示威者。

趙紫陽和他的支持者都相信他們至少能夠拉攏學生們中的中間派。他所計畫的是可以部分地滿足學生要求，並利用這一「群眾的授權」名義可暫時不理會生活水準的影響而加速資本主義的改革。強硬的史達林主義者，以及鄧小平和大多數的「改革」派是領導層中的實權派。他們更加害怕丟失面子，並且擔心他們如對群眾的壓力作出讓步就開了危險的先例。

最後鄧小平們獲勝，趙紫陽在政府內被孤立起來，他的關於學生「合理」要求的和解聲明被視為背叛。事實上，趙對學生的「支持」是不完全的。即使戒嚴當晚他最後一次含淚訪問廣場（隨行人中包括現任總理溫家寶）實際上是要讓學生停止抗議。這不是第一次了。他沒有參加關鍵的投票宣佈戒嚴的會議，理由是「生病」了。這些行動不是偶然的，並反映了他的派別非常猶豫不決和焦慮，該運動現在已經超越了他的派別或任何派別的控制。

工人國際委員會（CWI）國際書記處的林·沃爾什總結當時的形勢說道：「在關鍵時刻，官僚政權癱瘓了。所有的客觀條件都已存在，以和平或者相對和平的方式推翻官僚的統治完全可能實現。但是缺少了一個決定性的要素：具有清晰的綱領和戰術的領導層。[《戰鬥派》國際觀察，秋季1989年]

改良還有希望嗎？

當時在北京，警察已經撤離街頭，犯罪率在下降，甚至交通也由學生糾察隊負責。在5月中旬直到鎮壓前，已經出現了如馬克思所說的「雙重權力中心」的狀況。這用來描述一個受到動搖的政權與一個新的具有挑戰性的權力間為爭奪合法性而出現的短暫平衡狀況。但當時的中國只有一方面對此形勢有清醒的認識並準備採取行動。而處於上升中的群眾的「權力中心」卻對此沒有明確的意識也未能得以充分發展。學生們回避推翻現政府的目標。自始至終地強調於通過「改良」運動使現政府變得民主化。但多重複雜的政治與經濟因素意味著這一「改良」計畫並不切合當時中國的實際，而只有依靠以工人階級為主體的群眾運動發展出新的政府以取代當時的政府是避免「六四鎮壓」厄夢的唯一

選擇。

當時學生領袖犯了致命的錯誤，他們相信當局為迫於群眾的壓力而接受他們的綱領。但事實對於當局而言，這就意味著他們不得不與一批新組建的合法化的市民組織、學生聯合會、獨立工會分享權力，也就是說已經受到重創的專制當局不得不與數以萬計的具有經驗和自信心的活動分子和「幹部」分享政治權力。這也就意味著工人階級可能進行大規模的行業行動和政治攻勢以重新贏得他們在改革開放中失去的一切，要求確保國有企業的國有屬性和對於管理層全面監督。

鄧小平當局絕不允許這樣的事情發生。他們已經看見當時蘇聯史達林主義政權所發生的一切，各個民族共和國和不同階層的群眾紛紛挑戰中央政府的權威。假如在中國出現類似的情況就意味著政權的崩潰乃至可能國家的分裂。《華盛頓郵報》的記者約翰·派姆弗列特曾指出，「黨的領導人擔心整個共產主義的大廈都將崩塌。所以他們需要一個立足之地，哪怕是個血腥的立足之地；事實上通過這一方法向他們的國民證明，或者說寧可恐嚇他們的國民，以使他們服從。」

因此當時中國處於革命或者反革命的邊緣之際。在這種情況下，一個革命的綱領、領導層和黨派就是必須的。學生自己組織的領導委員會在運動的最初階段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通過使用大膽的策略和發起一系列對抗法律的示威鼓舞群眾的鬥志。但形勢的發展迅速超越了當時的組織和政治架構。學運的領導層缺乏清晰的政治意識和預測，也未能理解在這種形勢上是工人階級而非學生掌握了關鍵的力量，同時他們也沒有認識到他們所反對的當局會與其採取血腥的鎮壓而不是輕易讓步。

民主訴求

可悲的是，當時並沒有一個建立在反對史達林主義和資本主義基礎上的有組織的工人階級政黨在群眾運動中勇於站出來並承擔起領導的角色。儘管具有先進意識的工人群體已經察覺到目前的局勢由「抗議」演變成與當局進行生死攸關的鬥爭之時，他們依然期待著學生出面進行領導。在鬥爭中，他們更願意把自己看成是學生的支持者而不是鬥爭的中堅力量。在此我們可以說工人過度重視學生的領導能力，這不是否認學生在這次鬥爭中自我犧牲和獻身的精神，問題是如何正確地制定下一步行動計畫並評估其帶來的影響。

真正的社會主義運動將會支持學生們的民主訴求，但同時也會揭露資本主義制度下所謂民主原則的迷霧，並警告這將導致走上錯誤的道路。迄今為止，在資本主義世界的任何地方，群眾所贏得的民主權利都是通過大規模的群眾壓力和鬥爭才實現的。

社會主義者將給予學生的民主訴求以完全支持，但同時任何會指出這些訴求仍然是有限而模糊的。因為當時更多的不過是「民主萬歲」和「人民萬歲」之類相當泛泛的號召。而當時的狀況要求一個更為明確而清晰的對於前進道路的分析。關於自由結社權利的訴求其實應該相當明確的：社會主義者應該呼籲立即實現所有團體自由結社，只要不是法西斯主義和恐怖主義的團體，即使是反動的和新自由主義的政治團體也應允許建立。社會主義者應該支持新聞自由，這在 1989 年的運動中是個非常重要的問題，但這並不意味著新聞自由就是象貝魯斯科尼這樣的富豪巨頭可以通過收買媒體來操縱公眾輿論。真正的新聞自由應該是基於由國家資金支援但又不受到任何新聞審查的制度——從而支持印刷刊物和媒體網路的多樣化。一個獨立的媒體監督委員會應該由民眾選舉產生從而對整個體系進行監督以防遭到濫用。嚴格限制私有媒體是確保媒體自由和民主權利的重要保障。

支持民主訴求應該與反對親資本主義改革和反對損害國有企業的鬥爭相聯繫起來。對應的社會主義選擇應該是由工會選舉國有企業的董事會，而參與董事會的工人代表應該與普通工人拿一樣的工資並且隨時可以罷免和更換（正如斯蒂芬·喬利在他 1989 年與北京學生和工人交流時所提到過的）。「太子黨」所擁有的財富應該被沒收，並禁止任何

在社會主義制度選舉產生的官員和他們的家屬從事商業活動。

一個社會主義組織應該在群眾運動中積極地支持和宣傳這些訴求，但與此同時也應該提出相應極為重要的問題：如何能夠使這些訴求得以實現——通過怎樣的政府和社會制度才能實現這些訴求？為此甚至有必要指出學生們要求召開臨時人民代表大會的不切實際，因為這一政治體制事實上不過是中共高層領導控制下的「橡皮圖章」。要求召開人民代表大會的主張不過是浪費寶貴的時間和精力而已。類似的主張還包括，要求改組政府，或者如要求李鵬甚至鄧小平等個人的辭職，對於我們社會主義者而言我們認為需要一個完全不同的新政府。在這一形勢下，我們需要的是一個真正的「人民議會」，一個「革命議會」，這一立法機構將由所有民眾選舉產生，並對所有的政黨開放。這樣的立法機構將具有所有政治權力以應對社會危機，——削減行政官員的收入，對腐化的官員進行司法審判，提高工人和教師的收入（這在 1989 年是個極為重要的議題），增加教育開支，控制物價和提供食品補貼，由選舉產生的工人和貧苦農民組成委員會對整體的「改革」計畫進行全面審查，等等。

當學生忙於就他們的訴求進行演說並要求政府「傾聽」的時候，一個社會主義黨派或者組織應該圍繞這些訴求在群眾中進行立即和直接的動員。在每一個社區和工作場所都應該成立行動委員會，這些委員會由工人、學生和普通市民選舉產生。這些委員會將真正地包含有民主理想，而且只有他們可以被信任以選舉出一個真正的革命議會。

尤其是當戒嚴令頒佈後，這一任務變得更加嚴重和緊急，因為需要協調全國總罷工和群眾動員以反對軍事干預。而置於這些民主委員會控制之下的人民武裝將能夠使北京普通工人和市民發起的與進軍士兵的對話變得更有針對性和表達團結友愛的精神。但是正如斯蒂芬·喬利解釋的，學運領袖反對這一主張，並且拒絕接受來自軍工廠工人和同情他們的士兵所提供的武器，因為他們擔心這將超越抗議活動原有的框架。但不幸運地是，當時採取「升級」行動的想法已經在鄧小平的腦海裡，運動是完全「非暴力的」本質並不能促使他改變任何想法。在最後一部分的分析中表明，士兵們當時僅僅是不服從命令，但假如他們確信這裡存在著由非常嚴肅的組織起來的人民鬥爭以試圖改變現行秩序，他們會毫不遲疑地站到人民這一邊。

也正如林·沃爾什解釋的，「假如在過去的 6 周中存在有工人和學生的委員會，並且他們具有清晰的政治綱領；軍隊中具有決定性影響的力量就會與官僚體系徹底斷絕關係並站到人民這邊來…。[林·沃爾什，《戰鬥派》，1989 年 6 月 9 日]

反革命——工人領導的反抗

工人階級稍晚捲入了這場群眾運動，但一旦它介入其中就變成了決定性的力量。但很不幸的是，當時的當局圍繞在鄧小平周圍並成為壓倒性的力量準備採取鎮壓。這也可以解釋為什麼是工人階級而非學生在抵抗軍事鎮壓時起到了主要作用，數以十萬計的群眾走上街頭以保護「廣場上的學生」。這也同樣可以解釋為什麼許多屠殺事實上是發生在遠離天安門廣場的地區。正如斯蒂芬·喬利所評論的，「獨立工會的工人們接管了整個計畫。他們擁有全城的地圖，他們說到：『軍隊在這裡』在那裡…我們應該派工人的隊伍去這裡，去那裡…年長的女工（她們事實上在與軍隊討論和阻止他們開槍方面是最好的力量）應該派到那裡去，因為那裡有最兇殘的部隊。[斯蒂芬·喬利，《見證中國——天安門事件》，1989]

這裡值得強調的主要是工人——而非任何其他階層——勇敢面對屠殺和之後的殘酷鎮壓。許多學生活動分子，包括李民琪和汪暉等人被政府投入監獄或者接受「勞動教養」，但工人們遭到了最嚴厲的判決。沒有學生領袖被宣判死刑，但至少數十名工人被執行死刑。直到今天在網路上仍然能夠發現民眾中存在的強烈「被背叛感」；因為有些學生領袖在血腥鎮壓的前後紛紛逃離廣場乃至出國流亡，而將其他人留下面對鄧小平當局的反革命鎮壓。

鄧小平的「穩定」

通過鎮壓 1989 年群眾運動，中國當局鎮壓了一場反對史達林主義官僚體系的革命，但由此並沒有為史達林主義的復蘇掃清道路，而是促進了資本主義制度遠較之前更大規模地得以發展。正如托洛茨基對於政治革命的評價，「對（政治革命失敗）之後的政治預測有兩種可能性，或者官僚體系在工人國家中愈加成為世界資產階級的一部分機關，新的（工人國家形式）會被推翻從而使國家重回資本主義制度；或者工人階級會摧毀官僚體制並開啟真正通向社會主義的道路。」

而中國當時所發生的進程顯然有別於其他史達林主義國家。在東歐和蘇聯，這一復辟的進程仍然在進行中，柏林牆的倒塌發生在 6 月 4 日血腥鎮壓的 6 個月後。在東歐，史達林主義官僚體系中親資本主義的力量成功地將自己融入到那些反官僚主義的運動中從而確保這些的親資本主義方向。政治革命以一種所謂的「民主」形式遭到慘敗，群眾 20 多年來被置於新自由主義和經濟震盪中迄今仍然未能徹底得以擺脫。而中國政府在政治革命的開端對此進行了血腥鎮壓，而且由於鎮壓是如此的血腥暴力使它贏得了社會「穩定」以確保執行類似的社會轉型。（但關於「這一轉型的進程已經走了多遠，是否這一進程已經完成或者尚未結束」在工人國際委員會（CWI）中仍然是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

娜歐米·克萊因（Naomi Klein）將鄧小平的軍事鎮壓與智利皮諾切特的軍事政變進行了比較，「正如皮諾切特的軍事恐怖掃清了街頭的革命，天安門事件為極端的社會轉變消滅了任何群眾反抗的擔憂…整個國家的民眾處於恐懼之中，鄧小平得以無所顧忌地執行他的改革。[娜歐米·克萊因（Naomi Klein），《震蕩定律：災難資本主義的興起》，2007]

這一評論其實是恰當的。6 月 4 日的血腥鎮壓是中國工人階級的一個慘重失敗，它對於工人進行階級鬥爭起到的消極作用類似於 1973 年的智利和 1965 年的印尼。僅僅在血腥鎮壓 5 天之後，鄧小平在全國的電視講話中告訴全國人民，「可能這一不幸的事件能使我們繼續以更穩定、更好和更快的方式推進改革開放政策…」正如克蘭所解釋的，「鄧小平的行為使這一點清晰無疑，也就是他進行血腥鎮壓所保護的並非是共產主義而是資本主義。」是否之後鄧小平所執行的經濟計畫就如克蘭所描述的一樣清晰值得進一步討論，但很顯然大屠殺的製造者們並不準備捍衛計劃經濟。

有一個廣泛流傳的說法，「為能確保 20 年的穩定，鄧小平不惜殺死 20 萬人」。事實上整個社會不可能輕易保持整體的安靜，但這確實變成了他進行統治的基本教義。在鄧小平的「一石二鳥」計畫中，一方面他給予膽敢反抗的民眾一個教訓，另一方面他使黨內的反對派如趙紫陽派同情和鼓勵學生抗議活動的力量變得小心翼翼。鄧小平在這方面進行黨內控制就類似於電影《教父》中阿爾派西諾所飾演的麥克爾·克萊涅一樣，他告訴他犯錯的兄弟，「永遠不要站在反對家族的那一邊。」自從 1989 年以來在中共的統治上層內部達成了一個默契的協議不要公開之間的分歧。從此公開表達異見都成為黨的禁諱以免獲取群眾的支持。

在邁克爾·法舍斯（Michael Fathers）和安德魯·黑金斯（Andrew Higgins）的作品中，他們明確指出使用軍隊（進行鎮壓）「並非簡單地為了將群眾驅散，而是在於製造出暴力鎮壓的殘酷印象以恐嚇黨內那些對於反抗表達同情的力量。」其中一個意外事例也強化了這一效果，當軍隊在「中國最佳地段」的長安街上向位於木樨地的 22 號和 24 號「部長樓」開槍時，這些樓裡住著當時中共黨內諸多的高級幹部。「士兵們無差別地向 22 號和 24 號「部長樓」開槍擊以恐嚇裡面的居民就如同象許多其他建築物開槍一樣。[邁克爾·法舍斯和安德魯·黑金斯，《天安門——北京的暴行》，至少有數名公務員和高級官員的親屬被打死打傷。

「64」鎮壓之後哪股政治力量得勢了？

自由主義者認定的史達林主義「強硬派」是大屠殺的始作俑者其實是一個錯誤的觀點，雖然他們對於血腥鎮壓同樣有罪。即使趙紫陽的政治勢力被排擠之後，在政府內部仍然是「改革派」佔有優勢。政府當局在 1989 年 9 月將江

澤民升任為中國國家主席和黨的總書記，此後未久又將朱鎔基調任為國務院副總理全面執掌經濟。李鵬雖然仍然是總理，但日益成為一個象徵性的角色。江澤民和朱鎔基都是堅定的改革派，都來自於上海而且手上沒有沾上 6 月血腥鎮壓的鮮血。而且美國的國務院對於大屠殺之後的中國當局會進一步推動市場化沒有疑問，他們使白宮相信「新的（中國）領導層將繼續推動經濟改革雖然在政治改革上會採取更為保守的做法。」[美國國務院調查和情報局，1989 年 7 月 27 日]

西方各國政府雖然對北京政府實施了制裁，但這些措施本身並沒有多大影響力，而且主要集中在軍備銷售上。正如約翰·吉廷斯所指出的，「眾多外國政府希望仍然能在中國插上一腳。」

針對當局的特性，李民琪解釋了為什麼當局中親資本主義的派別整體上也支持鎮壓，事實上就力量對比而言當時「改革派」的力量仍然遠強于「保守派」。但「改革派」自身針對群眾革命運動分成了兩派不同的意見。「趙紫陽派」由於擔心此起彼伏的革命的浪潮準備與自由主義的知識份子做出妥協。但鄧小平作為「改革派」的領導人深刻理解在當時革命的形勢下，任何讓步都會從根本上動搖整個體系。而且當時群眾提出的「打倒官倒」的口號（官僚通過投機倒把而進行「權力尋租」的一種方法）直接威脅了「改革派」的經濟利益。同時鄧小平也明確地認識到對於革命的鎮壓並不會徹底破壞統治階級與中產階級的聯盟關係。通過給予中產階級和自由主義知識份子這樣一個痛苦的教訓，他們甚至會更為緊密地依賴與統治階級。此後所發生的一系列事件證明了鄧小平的判斷是正確的。[李民琪，《資本主義發展和中國的階級鬥爭》]

即使我們不同意李民琪關於 1989 年時官僚階層已經成為一個「統治階級」的分析，但至少他關於鬥爭的內在聯繫的分析是正確的。因為事實上自由派的中產階級，其中也包括部分學生運動的領袖，隨著中國新自由主義政策的進一步發展也就與當局「和好如初」。

今天的中國相較於 1989 年具有更多資本主義性質而更少的民主。自由主義者所宣揚的建立資本主義經濟體系需要實現民主被證明是根本性的謬誤。但這沒有阻擋今天仍然有一些團體還在那裡犯相同的錯誤，呼籲要求所謂的「更資本主義化」或者「真正的資本主義」，將此視為實現民主轉變的道路。今天的中國資產階級在現實中並沒有多大的動力要引入西方的議會民主制。由於擔心工人階級潛在的力量和現有的利潤體系無法使中國的資產階級通過提高民眾生活水準而「贖買」社會穩定，所以中國的資產階級在目前的环境下更願意依靠專制當局提供相應的保護。

中國新一代青年必須充分研究 1989 年群眾革命運動的失敗從而確保真正民主的理想能在全國範圍內通過群眾的遊行與鬥爭得以重新實現。但這次運動將具有一個清晰的目標：民主社會主義！



6. 4 之後

天安門廣場本身對於中國的群眾運動和革命具有「圖騰」般的象徵意義。從 1919 年的「五四」運動開始，無論是 1935 年「一二九」運動還是 1976 年「四五」運動，每一次天安門廣場上發生的群眾運動都已經成為人心向背的里程碑事件。即使 1976 年的「四五」天安門事件，毛澤東與「四人幫」面對民眾悼念周恩來的民主運動也只是動用了上萬軍警民兵（其中還以民兵為多數）手持棍棒進行鎮壓，而一貫以「開明」著稱的鄧小平恰恰就是這場運動的受益者。

所以，直到 6 月 3 日，絕大多數的中國人（不僅是北京民眾）並不相信軍隊真會向民眾開槍；甚至於很多人直到當夜士兵向他們射擊時，還以為槍膛中射出的只是空包彈或橡膠子彈。這也是 1949 年革命所帶來的「成果之一」和毛澤東政權數十年教育所致，人們無法相信「人民子弟兵」居然會向人民開槍？當時很多中國民眾的潛意識中會將 1989 天安門運動與 1976 年的天安門運動相提並論，多認為當局也許會動用暴力將佔據天安門廣場的學生與民眾驅散，但「若干年後」會認識並改正錯誤，這也是無論在香港還是大陸民眾一直呼籲「平反六四」的由來。

至於有人為當局辯護說由於缺乏防暴器械所以不得使用常規武器純屬無稽之談。當時雖然專業防暴器材數量不多，但在之前鎮壓西藏叛亂時軍隊和武警已經使用，而且各方證據都說明 38 集團軍在當晚的推進中，開路的數百人「防暴隊」裝備有很專業的防暴器械，但恰恰是他們首先在推進過程中開的槍。而且即使專業防暴器械不足，當時各參與戒嚴部隊也確實是做到人手配備一根木棒或者鋼管。

鄧小平所領導的中央軍委之所以下達「動用一切手段」也即授權開槍的命令的根本原因是在於他們的恐懼。至少在北京當時人民所動員起來的力量已經強大到足以癱瘓國家機器，從 4 月起北京的警員基本無所事事，就連交通也由學生糾察隊負責指揮，而且官方統計顯示 5 月份北京的犯罪率明顯下降；在政府失能的情況下，民眾已經開始在接管這座城市。也就是說假如當局不開槍，不進行血腥屠殺，不用現代化的武裝恐嚇，根本無力鎮壓這場運動和恢復他們所需要的「舊的穩定秩序」。

鄧小平當局為進行鎮壓到底動用了多少部隊？迄今說法不一，但 20 萬左右軍隊是可信的。北京到底有多少普通民眾走上街頭「防堵軍車」更難以計算，但是要將 20 萬全副武裝年輕力壯久經訓練的軍人堵在路上達 10 多天之久，顯然絕非是「一小撮別有用心之暴徒」所能完成的。參考各種資料可以相信在 5 月底到 6 月初上街封堵軍隊的民眾人數應不少於 50 到 70 萬，也就是說不分男女老少約近十分之一的北京市民走上街頭參與鬥爭。與此同時很多資料也表明 20 多萬進京實施戒嚴的部隊中相當多人根本毫無意願也無鬥志進行鎮壓。

5 月 19 日李鵬頒佈總理令北京宣佈戒嚴，其實 5 月中旬駐紮保定衛戍北京的 38 集團軍部分部隊已進至北京市郊。因為北京大學的新生軍訓都是在 38 軍進行的，所以不少北京大學學生前往進駐的部隊進行宣傳，很多軍人紛紛表示絕對不會與人民為敵。而在 6 月 2 日，軍委明令 38 軍第二天可以清場開槍的時候，38 集團軍軍長徐勤先裝病住院拒絕簽署調兵命令；為此徐當即被禁閉，後送上軍事法庭，監禁 5 年迄今渺無音訊。

「沙士英雄」原總後勤部 301 醫院軍醫蔣彥永 2004 年給中共中央當局要求「平反六四」的建言中也明確提到，1989 年 5 月下旬進駐 301 醫院的部隊在該院上下的勸說下，明確表示不會鎮壓學生運動，而當時沿東西長安街各軍事單位臨時駐紮的部隊面臨情況大致相同。這迫使軍方在 5 月底 6 月初不得不將大部分已進入市區但士氣衰弱的部隊撤到京郊輪換新到達的部隊。參與軍事戒嚴的部隊多數處於這種情況下，軍心渙散毫無鬥志；有些部隊如 39 軍等從 6 月 3 日下午到 6 月 4 日晚上一直在北京城內以「迷路」為名消極避戰。最終根據命令按時到達指定地點的部隊只有 38 集團軍和 15 空降軍，也正是這兩支部隊在 6 月 3 日之夜和 6 月 4 日清晨開槍進行血腥鎮壓。



血光之夜

6月3日下午4時由李鵬、楊尚昆、陳希同、劉華清等召開會議下達清場令，要求「6月3日晚9時開始平息暴亂，6月4日凌晨6時結束清場。」根據當局公佈的「共和國衛士名單」顯示，整個清場過程只有15名軍人死亡，且都死於6月3日晚10時半之後，這充分說明死亡軍人都是在軍方開槍鎮壓之後，民眾被迫反抗而死亡的，而且即使這其中還有為軍方自己誤殺的人員。各方面的資料顯示雖然民眾實際死亡人數無法統計但應在數百到數千不等，「天安門母親」運動迄今統計有實際姓名的死亡人員為188人，其成員目擊屍體總和估算不少於1000人；據說就連前國家副主席楊尚昆身前私下承認鎮壓導致民眾死亡人數也有600多人。

38集團軍由於軍長徐勤先被禁閉後，在軍委的威脅和北京軍區副司令員的監軍之下，由政委和代理軍長帶領，為保住性命和職位開始了瘋狂的「屠殺之旅」，但即使38集團軍中最後開槍的也非多數士兵而是少數的職業特種部隊。在清場的過程中，保衛天安門廣場的民眾與38集團軍在西長安街公主墳到木樨地地段和西單到南池子一帶發生的衝突最為激烈，多數群眾的死亡和受傷也多發生在該區域。根據蔣彥永醫生的「六四平反建言」中透露，當時他作為位於公主墳的總後301醫院的普通外科主任，從晚10點到12點陸續送來需要急救的被槍擊受傷人員89人，其中7人死亡；唯一一名受傷的軍人也並非是戒嚴軍人，而是訪親路過被流彈擊傷的。

從木樨地一帶一直到天安門前，數千乃至上萬工人與市民設置十數道障礙，並以自己的人牆阻止軍隊前進。根據目擊者和軍方資料表明負責開道射擊和清場的「防暴突擊隊」絕非是普通士兵，其中沒有剛入伍的「娃娃新兵」，並且該部隊6月5日就換防離開天安門地區。民眾一直傳說開槍鎮壓的部隊是「打過中越戰爭」的部隊，北京軍區的38集團軍未有成編制的參與過中越戰爭，所以他們很可能是曾經參與中越邊境輪戰的38集團軍直屬的特種精銳「偵察大隊」。

但民眾並沒有被屠殺所嚇倒，如天安門事件親歷者《1989年天安門廣場血腥清場內幕》一書的作者，原中國政法大學研究員吳仁華的描述：「我由衷地敬佩北京的工人弟兄們，他們雖然文化素質不是很高，也不善於辭令，但是，他們卻在關鍵時刻表現出驚人的英勇無私精神。實際上，在八九民主運動中，最具有道德勇氣、犧牲最慘重的不是學生，更不是知識界人士，而是北京市的工人弟兄和市民。為了保衛天安門廣場，保護天安門廣場上和平請願的學生，他們一直在用血肉之軀阻擋著武裝到牙齒的解放軍戒嚴部隊，浴血奮戰，奮不顧身。他們絕大多數人手無寸鐵，少數人手中僅有的‘武器’，也無非只是些磚頭石塊和棍棒而已，與戒嚴部隊軍人的衝鋒槍、機槍以至於裝甲車、坦克相比，顯得多麼地微不足道！」

同樣作為事件親歷者的工人國際委員會(CWI)代表斯蒂芬·喬利在其《見證中國——天安門事件》一書中也提到，「成千上萬的工人跟在(開槍的部隊)後面，他們手無寸鐵，其中一些還是女工，有些人騎著自行車。數千名工人跟在部隊後面卻沒法和他們作戰，他們只是唱國際歌。部隊後列的人不知道怎麼辦，士兵偶爾會開槍，大家會趴下，但你不知道有多少人被殺，因為他們每次又爬起來，死去的人躺在地上。人群就像沙灘上的海浪一次次地湧上來，他們

只是唱著國際歌。」

即使在 38 集團軍屠殺過去之後，民眾仍然沒有放棄抵抗，繼續在長安街上設置路障和阻攔後面的部隊。據空軍副政委劉亞洲在成都軍區的內部演講《信念與道德》中透露，「6月4日凌晨，跟隨 38 軍的 28 軍在長安街上遭遇市民阻攔，軍長和政委命令部隊就地停留一天未動。」根據吳仁華的文章，當時市民用從醫院取來的血衣向士兵證明之前經過的軍隊（38 軍）確實向民眾開槍後，28 軍的官兵表示震驚並拒絕服從任何命令，甚至在 6 月 4 日白天當軍委派直升機強令軍隊「不惜代價繼續前進」的時候，28 軍一輛裝甲車上的士兵（一說是退伍軍人）用機槍向直升機掃射。

午夜過後 38 集團軍進入了天安門廣場開始血腥清場，本來在廣場內殺人還是廣場外殺人並不重要，但無論是吳仁華還是斯蒂芬·喬利的書中都提及了軍隊確實在廣場上向人群開槍並出動坦克和裝甲車碾壓廣場上的帳篷。而且 6 月 4 日清晨在六部口附近 38 集團軍的坦克甚至碾壓已經撤離的學生隊伍。

吳仁華在書中描寫，他親眼目睹三輛坦克從天安門廣場方向開過來，一邊發射著散發出淡黃色煙霧的毒氣彈，一邊沿著正行走著數千名學生隊伍的自行車道快速地追趕過來。一時間，長安大街上瀰漫著淡黃色的煙霧。當時他和數百名學生為了躲避坦克追壓，紛紛拚死翻越綠色尖頭鐵柵欄，欲進入郵電大樓的大院子暫時避難，而把門的武裝員警竟然緊閉大門，拒絕讓學生們入內。待坦克過去，比吳仁華所處位置稍後的學生們已慘遭不幸，11 名學生當場慘死坦克輪下。

而斯蒂芬·喬利也說明了這一情況，「星期天早晨 6 點左右，我回到了天安門廣場。……有一次，部隊對學生使用催淚彈。學生們逃開了，許多人試圖爬過柵欄。有 11 位學生沒有爬過去，之後坦克過來了，沿著柵欄碾過去把他們碾死了。他們再一次露出來的時候，已經像火柴盒一樣平坦，他們死了。」

可能吳仁華沒有看見或者出於不渲染群眾暴力的目的，而沒有提及斯蒂芬·喬利還繼續描述的內容，「但那輛坦克與坦克群脫離了。工人們包圍了它，那情形就像一隻死老鼠上爬滿了螞蟻。他們扳掉坦克的蓋子，裡面有一名指揮官，不是一個普通的坦克駕駛員。他們把他拖出來，對他進行毆打，然後把他活活燒死，這些就像我們在 1984-86 的南非起義中看到的一樣。然後他們把他掛起來向遠處的部隊示威，警告他們。事實上，一旦大屠殺開始後，人們試圖控制局面，但他們現在別無選擇，在這個階段是沒有任何其他辦法的。」當時血腥鎮壓已經很明顯，民眾除了反擊別無選擇。

另一支開槍清場（主要開槍地點為珠市口）部隊是當時中國唯一一支快速反應部隊空降 15 軍。據傳從 5 月中旬起歸屬南京軍區的 15 軍士兵們就一直處於隔離中，十數天沒有看到報紙也沒有收聽廣播，只在登機出發被告知北京發生反革命暴亂需要武裝鎮壓。根據斯蒂芬·喬利在《見證中國》一書中記錄與法國記者的交談顯示，15 軍士兵們可能還給注射了確保清醒和警覺的腺上激素。2008 年 5 月 12 日四川發生汶川大地震，15 軍作為緊急預備隊被調往四川救災。面對總理溫家寶的百般催促但官佐們遲遲不肯傘降，被網友譏稱「犯我中華天威者只要天氣晴朗無風無雨，能見度高，地形不複雜，地面無人燒麥秸杆，雖遠必誅……」；最後溫家寶無奈之下也只能當著國內外媒體給 15 軍扔下一句，「人民養著你們，你們看著辦！」。20 年來，曾經的「人民解放軍」在民眾中的聲譽日降，1989 年的血腥鎮壓加上之後 20 年資本主義的復辟，軍人貪污違紀屢不勝數。「500 元一張黨票，50 萬一個團長」幾乎成為軍中的慣例。這支 80 年前曾經由一批具有朝氣和理想的知識份子和被壓迫最為深重的農民階層組成的「人民軍隊」，如今全然忘記自己的傳統，也不知該為誰而戰。

鎮壓之後的反抗

但即使在血腥鎮壓之後，群眾並沒有因此而屈服；相反當局在之後的近一周內幾乎處於失能的狀態。6 月 4 日當

天，北京各主要媒體包括《人民日報》、中國人民廣播電臺和中央電視臺等國家媒體的工作人員紛紛採取消極不合作的方式抗議當局的軍事鎮壓，中國國際廣播電臺的英文廣播甚至在 6 月 4 日明確表示因為「血腥鎮壓」而集體罷播。

根據《六四真相》一書記錄，在 6 月 4 日北京鎮壓的消息傳出當天，全國 63 個城市發生群眾抗議。上海從 6 月 4 日到 6 月 9 日，數萬學生與工人在全市範圍設置路障，並在人民廣場和市政府集會抗議召開悼念死難者的追悼會，6 月 6 日數萬學生市民在鐵路上臥軌阻攔從北京南下的火車發生著名的「光新路事件」；從 6 月 3 日到 6 月 9 日，上海工業生產大幅減產，數十家工廠停產，工業用電量下降 15%，全市交通受阻；時任上海市市長的朱鎔基不得不發表公開電視講話以示妥協，「上海不能亂，但上海市絕對不會軍管」。

6 月 4 日，成都中心廣場武警與上萬抗議的學生和群眾發生衝突，衝突持續一天時間，廣場周邊派出所和數十輛警車被群眾焚毀。哈爾濱、天津、長沙和廣州等市類似抗議不斷。

正如斯蒂芬·喬利在他《見證中國》一書中所描述的，當時很多國內民眾和海外媒體都以為是 27 軍在清場當晚開的槍，人們無法相信軍長抗命的 38 集團軍（而且對中國人而言，38 軍具有特殊的意義，他們曾在 1950 年代朝鮮戰場上因成功抗擊美軍而得名「萬歲軍」享譽全國）會向平民開槍。因為蒙受這「不白之冤」，從 6 月 5 日直到 6 月 9 日，27 軍在河北石家莊的軍部遭到數千學生與民眾連番衝擊，而且地方上的單位與群眾自發斷絕向 27 軍提供後勤供應。為此當 27 軍回到石家莊駐防後，從軍長到連長一級級地向地方政府和群眾解釋保證 27 軍在北京沒有「向首都人民開一槍」。這使同樣駐紮在河北的進行血腥鎮壓的 38 集團軍極為被動，並導致之後兩軍的長期交惡。

據統計，當時陸續到達北京的集團軍約有 14 個，但其中很多是用來互相鉗制的而非真正用來清場和戒嚴，特別是在出現 38 集團軍和 28 軍集體抗命的情況下，鄧小平不得不在 6 月 3 日連夜從南京軍區將其心腹機械化 12 軍調到北京以防其他軍隊可能進行軍事政變。直到 6 月 9 日，鄧小平公開接見進京戒嚴部隊並進行電視轉播時才意味著當局真正重新控制局面。雖然在 89 年曾經一度宣傳「平暴勝利」並公開嘉獎戒嚴部隊，但之後不到一年的時間內所有相關宣傳嘎然而止。十來年中，中共高層，無論是鄧小平、楊尚昆還是李鵬等人紛紛通過家人或者出書的方式撇清自己表示自己沒有下令開槍，而參與戒嚴的部隊官兵甚至要求從檔案中剔除關於自己參與「64」鎮壓的記錄以免被周圍的人另眼看待。而官方宣傳中「反革命暴亂」也被稱作「政治風波」。當權者開槍了，卻沒有一個人敢站出來承擔這一歷史責任，他們所能選擇的方式只是遺忘。

據不完全統計，自 6 月起中共當局持續整整 1 年對社會上反對力量進行鎮壓，有 4 萬多人被逮捕，5000 人被判刑，100 多人被處決。根據官方法律出版社出版的《中國法律年鑒》的統計顯示，1989 年以反革命罪收案為 572 件，1990 年為 716 件，總計 1288 件，其中絕大部分都與 1989 年的群眾運動相關；而 1987、88 和 1991、92 共 4 年以反革命罪合計收案不過 1171 件，後兩年中部分案件事實上也與 1989 年的有所關連。最終遭到長期監禁乃至處決的絕大部分都不是學生領袖和知識精英，而是最普通的工人和市民；相反不少著名的民運領袖卻得以輕判或者出國躲避。據說王丹在國內被通緝躲藏期間，一個普通餐館老闆僅僅因為給他提供 2 頓免費飯菜被關數月。據信迄今仍有約百人由於「64」鎮壓被關在獄中，而很多即使出獄的普通工人和市民也生活艱難，妻離子散。

在 6 月 3 日晚上和之後的相當一段時間內，是一些最普通的北京工人和市民在血腥鎮壓的最後關頭勇敢地站出來以自己的血肉之軀反抗暴政，為 1989 年群眾革命運動寫就了不朽的篇章。

「64」之後

正如馬克思對於 1848 年歐洲革命的評論，「1989 年群眾運動的主要成果不是中國人民贏得了東西，而是他們失去了東西，——他們丟掉了幻想」。

「64」之後，中國民眾既失去了「假平等」也沒能贏得「偽民主」。1989 年之後的 20 年裡，1949 革命所贏得的諸多社會成果幾乎喪失怠盡，同時民眾也沒得到少數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精英所吹捧的「市場經濟下的資產階級民主」。正如莫里斯·邁斯納在《鄧小平時代》一書所說的「真正意義上的民主是被中國人民所珍視的。它不應是一種僅僅由學生和知識分子所執有的觀念。中國人對民主權利的要求萌發於世紀之交，而後迅速從革命知識份子和學生傳向城市大眾。」

1989 年運動從一開始缺乏重要的成功因素，群眾與領導層互不瞭解對方的動機和立場，更談不上整場運動擁有明確的目標和策略。處於史達林主義一黨專制政權統治下的工人階級與民眾需要的是一場政治革命，是在仍然保證原有的國有計劃經濟體系和全民社會保障的情況下，結束一黨專制，允許自由結社；並停止已顯露邪惡的資本主義「市場改革」；這應該是一場真正的社會主義政治革命，而非是某些親資本主義知識份子所希望的「西方化的民主」。在這裡談論民眾在運動中是否需要「保持理性和忍讓」或者要遵守「現存國家的法律和秩序」毫無意義。正如馬克思所說的，「與法學家的幻想相反，社會不是以法律為基礎的，相反地，法律應該以社會為基礎；法律應該是社會共同的、有一定物質生產方式所產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現。不顧社會發展的新的需要而保存舊的法律，只會造成社會危機。」

1989 年運動的領導核心是小資產階級（或者資產階級化的）精英知識份子，他們所具有的天生軟弱性使他們無法獨立承擔政治任務，往往最終會與統治者媾和，更由於他們在根本的經濟政策與意識形態上與當局導向的合拍，使整場群眾運動最後被「無意識地」血腥葬送。他們從一開始就想盡辦法將普通民眾排除在外，害怕群眾會超越他們所設定的種種目標；而後又不得不依賴於群眾的力量以壓迫當局作出讓步。每一步反應和「正確的決定」都是在猶疑不定中被迫做出的。4 月時學生排斥工人群眾參與遊行如此，5 月拒絕總罷工也是如此；而當軍事鎮壓已經不可避免之時，卻仍然寄望於「改革派」上層官僚在權力鬥爭中勝出和堅持所謂的「和平理性」的鬥爭。在形勢有利的時候，坐視時機白白錯過，在形勢惡劣的時候，不知變通又手足無措，反使民眾和自己成為了鎮壓的犧牲品。

如何理解 1989 年的運動對於已經死去的、曾經鬥爭過的乃至今天仍然在堅持鬥爭的都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假如我們不能真正認清和瞭解 1989 年群眾革命運動發生的前因後果及其對我們和整個世界的影響，我們根本無法理解這 20 年乃至 30 年中國社會的變遷，我們也無從認識和探知中國在這個新世紀的走向。「64」那夜的血就象「禁忌」一樣深深地封存了人們的記憶，整整一代人尤其是其中的所謂「精英們」被折斷「脊梁」沉迷於金錢和墮落之中。在當局謊言的層層塗抹下，對於中國新生一代的青年來說，「1989 年」、「64」和「天安門事件」就象從未發生過一般，他們從出生起就患上了「先天失憶」。

但無論多少謊言都無法掩蓋真相。事實是 1989 年運動之後，20 年來中國所出現諸多熱點事件，每一次體制內外的突破和鎮壓，最近的如《08 憲章》、《新京報》回收、《讀書》更換主編、「新毛派」的崛起、「愛琴海」網站被封、《冰點》停刊，每一件事以及這些事件背後的人都最終可以追溯到 1989 年的那場運動和 6 月 4 日的那個凌晨。而中國各地所發生的此起彼伏的群體性事件，工人罷工、農民騷亂還是市民抗議也好，「64」的血都成了擺在人們面前一道難以跨越的心理障礙，——「他們（當局）殺過人，他們會不惜再殺人」。「64」成為了所有中國人無法繞過的一道坎，假如不能正視 1989 年的運動和「64」的鎮壓，那麼中國社會的突破與出路也無從談起。

新的選擇

1989 年 6 月 3 日到 4 日及之後的一系列血腥鎮壓使工人階級反對一黨專制官僚國家體系的政治革命的嘗試還未開始就已經失敗。這其中固然存在諸多原因，但根本原因在於在斯大林主義的畸形工人國家中，長期受官僚體制壓制和扼殺的工人階級缺乏真正的以馬克思主義理論所指導的政治綱領，缺少由工人階級自組的民主的獨立工人組織和工人政黨，自然也無法使工人階級在當時條件下擁有進行政治革命的正確戰略。

官僚階層或依賴於工人階級，或依賴於資產階級以維持自己的統治。當舊的毛澤東時代專制官僚體制變得聲名狼藉，而同時被扭曲的計劃經濟體系也失去活力；尤其是毛澤東 1976 年死亡之後，中國的史達林主義官僚政權在鄧小平的領導下 10 多年來「尤抱琵琶半遮臉地」進行著資本主義的「改革開放」和一黨官僚體制下幾乎是明火執仗的「貪污腐化」，這最終導致民眾為追求民主平等和經濟保障而爆發 1989 年的群眾運動。

中國學者汪暉將 1989 年中國的群眾運動與之後 1990 年代末和 21 世紀初歐美所爆發的反全球化運動聯繫起來固然可能有「過度詮釋」的嫌疑；但 1989 年中國當局對群眾運動的血腥鎮壓，與整個蘇聯和東歐地區史達林主義政權的分崩離析；和世界範圍內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和市場經濟的「急歌猛進」確實存在著內在的相互呼應。而這種世界性政治經濟局勢的變化更使中共官僚政權為維持自身權力和特權而「別無選擇地」（或者說「『欲』無反顧地」）將資本主義復辟進行到底。

「89 的血加 92 的蜜，即使聖人也會變惡魔」。資本主義制度的捲土重來與一黨專制官僚體系的倒行逆施，終於用最骯髒的「權貴資本主義」的土壤培育出了「中國經濟奇跡的曼陀羅之花」。而這一「經濟奇跡」建立在如下的代價之上：中國在 30 年內從世界上收入最平等的國家之一變成了世界上貧富分化最嚴重的國家之一；占全國家庭總數 0.4% 的 150 萬個家庭控制著社會總財富的 70%，當 2008 年中國超過美國成為繼日本之後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費國的同時，中國仍然有超過 2.6 億人每天生活費用不足 1.25 美元，是僅次於印度之後世界貧困人口第二大國。2.6 億農民工多在如同勞動集中營般的「血汗工廠」中每天工作十幾個小時；6000 萬辛勞一生的國企下崗工人被榨幹拋棄；在為世界最知名品牌生產的流水線上有著 300 萬被奴役的 14 歲以下的童工。以「市場化為導向」的社會保障體系的崩解帶來的結果是：教育產業化導致 2 個農民一年不吃不喝的收入供養不了一個大學生，而靠賣房賣血培育出來的大學生卻是畢業即失業；醫療產業化結果導致 60% 的農民因無錢而放棄看病，垂死的老人在太平間中度過人生最後的日子；住房產業化導致中國住房私有率甚至數倍於歐洲國家，2 倍於美國；即使所謂的「城市高薪白領」也因上數十年的債務成為「蝸牛房奴」。

不僅 1949 年革命所帶來的並不完善但相對普及的社會成果喪失殆盡，也使 1990 年代之後中國民眾極為混亂的意識形態極端化地向兩維擴張。假如說今天仍然身披「共產主義」外衣的當局所執行的政策都是歷史必然的話，那麼 1949 年革命本身的意義何在？

在這一思維緯度下本來早已死亡的國民黨政權反而具有了某種「借屍還魂」的道統性，在民眾尤其是一部分青年人中形成了所謂「親三民主義的泛藍派」，但他們全然忘記了國民黨腐敗政權的垮臺並非是來自於「外國的陰謀」或者「土共的狡詐」，而是數億中國人在貧病交迫和惡性通貨膨脹之下的必然選擇。

假如說今天中共當局所執行的政策都是錯誤的，由此仿佛得出的結論也就是 1949 年革命基礎上建立的毛澤東政權顯然是「唯一合法的政權」，毛政權相對清廉的史達林主義一黨專制官僚體系和災難性的文化大革命反而吊詭地變成理所當然，在青年中因此產生了相當部分自居革命的「紅色的毛澤東主義者」，但即如此，為什麼毛政權在造成民眾的慘重損失和政治信仰空洞後，在 1970 年代無法繼續運轉下去？

無論從哪個角度看，現中共當局在岌岌可危中保住政權與特權卻失去了「統治基礎」。今天能維持其統治的只剩下兩件主要工具：恐嚇與利誘。暴力的恐嚇只有在人們相信暴力可能帶來的後果時才會起作用，而並非在於暴力事實上的實施；甚至從某種意義上而言，當暴力一旦頻繁地實施，那麼恐嚇所能起到的效果也會逐漸減弱。根據官方統計在 1989 年血腥鎮壓 4 年之後，1993 年中國的群體性事件不足 1 萬起，到 2006 年該數字達到 9 萬起，而最新統計的 2008 年數字則已經突破了 12 萬起。在此期間當局的鎮壓手段越來越先進而且投入的資源越來越多，但群體性事件的數量則明顯呈線性增加，無論是 2008 年 6 月 28 日發生在貴州省的「甕安事件」還是 2009 年 3、4 月間發生在河北省保定的「依棉工人罷工事件」都反映出群體性事件越來越「組織化、持續化、擴散化」的趨勢。當局暴力恐嚇的嚇阻性正日漸衰弱，越來越多的時候官僚當局不得不採用暫時的妥協和犧牲部分權益以平息事態。

利誘是否能成功取決於現實的經濟利益與遠期的預期收穫。「穩定」曾經成為中共當局手中的一張王牌，而這又與 20 年來的經濟快速增長密切相關。當局一直以來「循循善誘」勸導民眾，只有「穩定」才能保住你們到手的「麵包」，也只有「穩定」才能在未來「可能分到更多的麵包」。但問題在於，資本主義生產規律導致的必然貧富分化，使越來越多的民眾被排擠出「享受經濟高速增長成果」的佇列中。無論是農民、農民工還是城市工人在過去的 20 年中實質收入增長遠遠趕不上經濟增長的速度甚至出現實質性下降；但同時民眾看見的卻是富者愈富和財富越來越向少數人手中集中的趨勢。而且在新世紀的世界性經濟危機下，慘澹的資本主義制度前景更難說會給民眾帶來什麼遠期的預期收穫。

特別是在徹底拋棄意識形態和失去政治信仰的情況下，官僚體系內部也只有依靠特權和利益的誘惑才能勉強維持統治；中國官僚和權貴精英們所承襲的「集數千年之大成」的貪污腐化和道德墮落在今天已經達到令人髮指的地步，套用中國網路上的流行語就是「他們沒有突破不了的道德底限」和「處級幹部兩個當中槍斃一個，肯定會有漏網之魚」。

但社會資源總是有限的，隨著官僚與資本家越來越欲壑難填，就連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新生的統治基礎「中產階層」也日漸不堪重負。「穩定」所能帶來的「現實經濟利益」和「遠期預期收穫」與這個社會中的大多數人毫不相干，故越來越缺乏現實意義，「穩定」本身也漸變得無足輕重，這同樣可以通過群體性事件數量猛增得到佐證。

莫里斯·邁斯納在《鄧小平時代》一書的結論是，「中國的社會主義未來，如果還存在這樣一個未來的話；它將不會來自於現有的社會和政治體系的演化，而更會來自於民眾對現行體制的集體性反抗。它不會是市場經濟成熟的結果，而恰恰相反會來自於（民眾）民主鬥爭以反對資本主義制度所帶來的社會後果。就歷史而言社會主義是資本主義的天然對手，而對於中共一黨專制政權的抵制將會同時具有民主和社會主義的特徵。因為中國的資本主義已經無法分割地與這個國家體系和它的官僚機關糾葛在一起，這樣一場社會主義的鬥爭將不可避免地導致與現中共當局的衝突。」

托洛茨基在《不是工人國家，也非資產階級國家？》一文中論述，「官僚壟斷權力乃至生產力的停滯尚未自動更換社會及所屬國家的階級性質。誰能改變這一性質？只有一種手段——革命或反革命暴力對財產關係的干涉。」假如沒有「64」的血腥鎮壓，中國的資產階級反革命就很難獲取勝利。同樣出自上文，「假如資產階級反革命獲勝，復辟當局將被迫暫時依靠國有經濟。『政經分裂』是各種社會轉折的必經時刻。」在「64」血腥鎮壓之後的二十年內，雖然曾經在 1989 年到 1992 年出現階段性的「經濟改革」進程的停滯或被外界認為是停滯。但事實上很多市場化的「改革」仍然在進行中，而且所謂的中共保守派在是 1989 年之後被徹底趕出了政治舞臺。而迄今整個國家機器仍然是波拿巴式的一黨官僚體制。但無論是 1992 年進一步推動市場經濟改革、對外貿易體制和匯率體系的放開、還是 2001 年加入 WTO、乃至 2002 年對黨章的根本性修改並允許資本家正式入黨，都意味著中國整個社會和經濟體系的資本主義復辟進程。

換而言之，在目前的中國要實現社會主義的唯一現實途徑只有徹底終結現存的已經全面採取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波拿巴主義的一黨官僚國家體制。正如托洛茨基在《總結與瞻望》說提到的，「國家本身不是目的，但卻是組織、解散和改組社會關係的最大工具。革命是社會力量在爭取政權的鬥爭中進行的公開較量。」每一場新的革命都起始於實現上一場革命未能完成的任務——掃蕩殘存的舊有的反動力量，而它是否能實現自己的最終目標又往往受限於上一次革命所達成的成果。但對中國而言，這將不再是一場本應發生在 1989 年的一個「畸形工人國家」中的一場政治革命，而是一場對中國社會的經濟體制和政治秩序進行徹底性變革的社會革命。尤其是在 21 世紀全球性資本主義危機條件下，中國的革命將重新提到歷史議程之上；這場革命則應該也必然是一場由中國工人階級和勞動大眾民主地、自下而上地、以計劃經濟為根本生產方式的、以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指導的、並且作為世界革命一部分的社會主義革命。也只有這樣一場革命才能使今天的中國擺脫重重危機，使中國的工人階級和所有受壓迫階層真正掌握歷史發展的方向，並最終推動整個人類社會向前發展。

見證中國·天安門事件

【編者注】本文作者斯蒂芬·喬利 (Stephen Jolly) 是澳大利亞大墨爾本區亞拉市一位托洛茨基主義市議員，27 歲時曾作為工人國際委員會 (CWI) 代表在中國親身經歷了天安門事件。《見證中國——天安門事件》一文是根據斯蒂芬·喬利 1989 年 7 月在倫敦舉行的演講整理而成的。

我在中國親眼目睹並親身經歷了這場發生在一個擁有世界上四分之一人口的國度的政治運動。雖然他們的政治經驗和組織經驗仍然略顯幼稚，但我深感很有幸能與北京和上海等地的工人和學生進行交流。並且，我不得不說沒有什麼能比我所親眼看到的更令人感到震驚，這是我從事政治運動以來見到的最為壯觀的事件。

在大屠殺發生前的一個星期天我到達北京，也就是五月最後一個星期天（譯注：5 月 28 日）。剛安頓下我就直奔天安門廣場，此時一場規模龐大的遊行正在進行中；為此要進入天安門廣場本身就如同一場「戰鬥」。

這場遊行大約有 20 萬人參加（我後來才發現，有些學生們對於這樣規模的遊行仍然感到不夠滿意）。由於是星期天，許多工人們不上班，他們主動加入到遊行隊伍中。遊行隊伍沿八車道的主幹道（譯注：長安街）行進，數公里長的隊伍一眼望不到盡頭，佇列中到處都是寫著中國字的紅旗。其中有代表鋼鐵工人的、大學生的、教師的等等，大家都齊聲高唱《國際歌》，高呼反對當局的口號。

我想此景象足以揭穿史達林主義的中國當局所製造的謊言，而且這些宣傳也為西方資本主義媒體廣泛採納；這就是他們都異口同聲地聲稱中國所發生的這場大規模群眾運動是一場「反革命的」或者「親資本主義的」運動。但事實上從運動開始到結束，我沒有遇到過任何一個學生、工人或者農民向我表示希望這場運動能在某種意義上或某種形式上推動資本主義制度在中國的發展。

天安門廣場

我花了三個小時才到達天安門廣場，說實話那裡的景象真讓我大開眼界。北京的中心——殘酷的史達林主義當局統治下的天安門廣場——像是正在訴說什麼。它如此之龐大，可能有四到五個板球場或五到六個足球場大小。最有意思的是廣場中間的石碑，它就是代表著中國共產黨歷史的人民英雄紀念碑。毛澤東曾經多次在廣場上講話，過去許多大型政治集會都是在此舉行。但今天的天安門廣場被大量的帳篷所佔據，這些帳篷有的是中國國內生產的，也有來自香港或者西方國家的捐助。帳篷裡仍然住著一些絕食學生，雖然大多數絕食者已經結束了絕食。

天安門廣場的北頭是紫禁城，（天安門城樓上）高高地懸掛著毛澤東的畫像注視著下方。我不知道當他看到在他面前發生的這一切的時候是怎麼想的？（這是北京城內僅存的一幅大型毛澤東畫像。並且，在青年人的腦海中幾乎沒有留下什麼對毛的印象。）很顯然，在毛去世後，中國的官僚們發動了一場反對毛澤東的政治運動。文化大革命成為了毛澤東的一個汙點。毛的妻子（譯注：江青）及其他「四人幫」成員無疑遭到政府和普通百姓的痛恨。但有些老工人還依稀記得剛剛解放之時（共產黨政權）與今日的大大不同。相對於今天，當時官僚們受到更多限制，腐敗問題也少得多；而如今人們卻經常可以看見高級官僚和軍隊大官們開著高級轎車在北京城中橫衝直撞。儘管天安門廣場周邊東、西、南三個方向的建築非常雄偉，但是相對於廣場上大量的人群而言，又顯得很是渺小。

我覺得我仿佛正處在世界的中心。你每天可以從電臺、報紙和電視，從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看到、聽到天安門廣場上的工人、學生和農民。在這裡幾乎聚集了當今資本主義世界所有新聞媒體的精英們，但更重要的是在這裡你可以看到中國學生中的精英和全世界四分之一人口中的無產階級精英正彙聚在此進行抗議。



當一到達我就急切地想要去找現場的人們談談。起初，我非常擔心：我要如何去瞭解他們？你在學校裡一定曾經聽到許多關於「竹幕」的故事，你想要知道作為來自地球另一面的人你能夠做些什麼。而你對中國又有多少瞭解呢？顯然他們的所作所為絕非兒戲，他們正在進行絕食抗爭並冒著被鎮壓的危險把自己的生命投入到這場運動中來。他們正在感受殘酷的鎮壓，並將在一周後感受到更為殘酷的鎮壓。

但一旦走進帳篷的時候，我的恐懼和擔心就變得無影無蹤了。在走進的第一個帳篷裡，我見到一些從上海趕來的學生，他們已經在這裡好幾天了。真是很幸運他們中的一些人能夠說英語。我坐下來，他們問我，「你是記者嗎？」

我說，「不，我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我是來自西方的社會主義者！我來這裡就是想要直接聽你們講講發生的一切，因為我不想倚賴資本主義媒體的記者報導來獲知你們的情況。我要聽到你們自己的敘述。我要讓你們知道通過鬥爭，你們已經征服了全世界的工人和青年的心靈。我們希望能向你們學習，你們為我們指出了一條前進的道路。同時我也想與你們交流經驗，因為我們在海外的政治經驗和組織經驗或許會給你們一些幫助。」

狂喜

我一旦表達有人支持他們的觀點，你可以明顯看見他們的狂喜。他們拿出小板凳讓我坐下，並且使勁地給我讓煙，幾乎把煙捲放到我的嗓子裡了。當然，我還是堅決拒絕了他們的這種熱情。他們還熱情地給我拿來冰涼的飲料。你要知道當時學生們是多麼貧窮啊（稍後我再細說這方面的內容）。儘管他們已進入大學，但從經濟狀況上說並不屬於特權精英階層的一部分。這些學生，有些人正在絕食中；但他們對待我就象對待國王一樣，就因為我是一個社會主義者，我願意支持他們。

當我開始交談的時候，又有數十人圍到我的身邊；這時帳篷裡已經塞滿了五十幾個人。要不是容不下本來還會有更多的人；幸虧我坐的比較低，否則人們根本聽不清我說話。這不由地讓我想起約翰·瑞德的著作《震撼世界的十天》（譯注：美國記者和社會主義者約翰·瑞德撰寫的關於親歷 1917 年俄國十月革命的書籍）。而目前我所經歷的現實甚

至超過了他書中的描寫，因為我並非是作為記者來到這裡，我是來這裡學習的也是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和組織方法來說明這場運動。

在討論中，他們向我描述了過去幾周所發生的一切，以及學生運動在中國全國越來越受關注的情況，並且也探討了他們對於未來的分析和預期。他們另外很關心我能給他們提供什麼樣的幫助。他們談到：「我們已經得到海外大量的資金支援，但是我們需要比金錢更重要的支持，尤其是思想的支持。這是你們能說明我們最好的方式」。相同的內容在之後的其他討論中也被多次地提起。

就如同與上海學生的對話那樣，之後我也曾不斷對其他人重複相同的觀點，「我簡要說一下你們需要做的第一點，大家都要明白學生運動與工人運動聯繫的重要性，依賴學生本身的力量不可能贏得這場鬥爭。」接著我談到了工人階級領導權的問題，講述工人階級必須領導這場鬥爭的原因，以及學生們應該利用每一個可能的機會在運動中逐步向工人階級靠攏並努力促成建立獨立工會的運動。因為它是取得勝利最為關鍵的因素，這不僅僅是對於工人，而且對於學生本身也是如此。我們又談到了這個問題，即為什麼 1917 年工人階級領導的俄國十月革命不同於中國革命，這是因為 1949 年的中國革命並不是由工人階級領導的革命。

我們要談的第二點就是這場運動的落腳點，即工人運動和學生運動的真正要求和綱領應該是什麼。我認為有必要將學生運動和工人運動聯合起來一起推動整場運動向前發展。我們應該堅持列寧反對官僚主義的四個基本觀點：所有官員由選舉產生、官員的工資收入不應超過技術工人的收入，實現新聞自由，反對一黨專政，給與所有堅持計劃經濟而又保持獨立性的普通民眾自我組織和自由表達的權利。我們強調工人武裝的必要性，但這絕不是依靠六、七個武裝起來的工人把鄧小平或李鵬拉下臺的。我必須承認，學生中還存在一些恐怖主義的思想。只要不是進行全民武裝的想法都應該堅決摒棄的。我們不需要一支「人民的解放軍」，而需要武裝的全體人民，這才應該是我們的目標。

史達林主義體制下的民主改革？

關於我們討論的第三點，……我必須說，這是在討論中最難以被接受的一點，儘管在十次討論中有九次最終我們的觀點得到了支持。具體的問題是這樣的：有沒有可能在史達林主義的中國，甚至蘇聯或者東德，通過正確的綱領利用強大的工人運動或學生運動從斯大林主義政權那裡爭取到民主權利？因為那些上海學生以及其他學生還有工人都對我說：「我們認為這是可能的。你們看看蘇聯今天所發生的變化，看看波蘭正在進行的選舉，再看看西方國家，你們的資本主義制度是比我們現行制度更糟糕的制度，但是你們擁有民主權利。我們在一個所謂的社會主義國家難道不能擁有民主權利嗎？」這些問題都有必要從理論上給於他們圓滿的回答和解釋。

順便值得一提的是，儘管是透過中共官方的新聞媒體 學生對外面的世界瞭解並不少。至今由於中國的官僚當局與美帝國主義之間存在的利益衝突，他們瞭解美國黑人所面臨的情況、美國存在的大規模失業問題和貧富懸殊。他們還報以同情地分析巴基斯坦政權以及智利獨裁政權，因為這些都是中國的官僚政府所支持的外國政權。中國政府的報紙也引用了大量國際上各資本主義媒體的相關資料。

中國的官僚體制

尤其是，他們瞭解許多關於東歐和蘇聯的訊息。鄧小平及其領導的官僚們基於本身的利益，鮮明指出蘇聯的民主改革所存在的問題。他們認為這對統一百姓的思想有很好的效果。大約兩個月前，鄧小平對官僚中的精英分子發表了重要講話。據香港報紙報導，「現在我們有兩個選擇」，他說，「我們可以走戈巴契夫的老路，但對於一個 10 億人的國家相當於玩火。看看戈巴契夫的改革已經帶來的問題，他實實在在地發動了一場反對自己的運動；他覺得自己很聰明，其實不是。在中國，除了保持頭腦清醒和維持現狀我們別無選擇。譬如說，假如我們為能確保對十億人的統治，就是殺死 100 萬人也沒什麼關係」，在這一點上鄧同舊中國的帝王們對普通百姓的蔑視沒什麼兩樣。儘管中國官僚當

局拒絕走戈巴契夫式的道路，但是如今其仍然不得不面對眼前的運動。

無論如何，我們試圖回答在史達林式的國家實現民主改革的可能性的方式就是這樣。首先，中國的國情與西方不一樣，西方國家的資產階級可以通過擁有的生產資料來操控國家的經濟。它也通過國家機器擁有政治權力。在面對強大的工人運動時，資本家有時會被迫接受一個工黨政府，甚至是一個左翼的工黨政府；即使左翼的工黨政府能組建內閣，但對資本家而言只要他們仍舊能夠對政府發號施令和 control 社會經濟就足够了。例如，澳大利亞目前的局勢就是如此。

我在討論中說明，只要擁有強大的勞工運動和工會力量，爭取基本民主權利在資本主義世界中是可能的。但同時我又回顧了之前所說的，在資本主義國家裡事實上只有 15% 的人口擁有所謂的民主權利。不過，他們也是通過鬥爭才贏得權利的。我提及了例如歷史上爭取婦女參政權運動，女工在英國是如何贏得選票的。19 世紀 50 年代澳洲的尤里卡寨工人暴動，澳州工人階級獲得選舉權。選舉權不會由（統治者）放在盤中白白賜與的。

同時我說明在史達林主義政權控制的世界裡問題是完全不同的。為什麼呢？俄國 1917 年十月革命後和中國 1949 年革命後，經濟上已經實現國有化；官僚們取得了國家政權。國家的全面控制是經濟調控的主要杠杆，因此，對於官僚們而言，如果失去國家政權他們將失去特權，他們將變得徹底的血本無歸。就鄧小平本人而言，今天如果他失去了政權，甚至可能會被吊死在最近的電線杆上。因此，中國的官僚們將不得不對工人階級和學生爭取真正的民主權利的運動進行堅決鎮壓。

訴求

一旦問題進行了充分討論，並且在理論上接受了我們的主張；那麼我們不得不要問我們自己由此可以得出什麼樣的結論？

結論其實很簡單。當前我們所應提出的訴求將是一系列基於過渡綱領的過渡訴求，包括列寧的四點基本主張，培育和建立獨立的工會運動，進一步發展的學生運動，並將之與工人運動結合起來等。與此同時，不僅對於運動的領導人來說，對普通的工人和學生來說，只要存在任何值得憂慮的可能性，隱瞞所必須面對的可怕事實都是絕對錯誤的：現實是在中國，工人和學生的要求不可能從在中共當局和它的治權之下所獲得。這是絕對不可能的！

學生們談到，是否可以寄希望於中國共產黨內部的改革派，趙紫陽是否可以依靠？其實對此抱有幻想的學生和工人不到西方媒體宣傳比例的一半，尤其是在比較活躍的工人和學生中更是如此；當然這種情形也的確存在。因此，我們討論了波蘭的形勢：選舉並不代表波蘭社會民主化的開始。導致此現象發生的原因是 (a) 因為波蘭團結工會的領導人瓦文薩被雅魯澤爾斯基和波蘭政權訓的服服帖帖 (B) 因為他們進行的僅僅是非常有限的民主改革，而並非是把真正的民主權利和權力歸於人民。這也就存在這麼一個問題，官僚階層表面上進行有限度的改革來設法防止自下而上的革命。我還指出在蘇聯在進行改革的同時，公開地鎮壓格魯吉亞的群眾運動。由此我們得出的結論是任何學生和工人的綱領都應該關注如何建立一個新政府、一個新的革命政府，從而實現一場政治革命，而這也正是我們馬克思主義者所必須做的。換而言之，工人和學生需要接管政府的權力。事實上，只有如此，變革才可能實現，並能永久地實現變革並真正關注中國最廣大群眾所關注的問題。一旦這一結論得到認可自然也就推導出進行組織建設的問題。

而之後一切變得更容易了，因為大多數的學生和工人對於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的著作都有一定的瞭解。雖然沒有多少人知道托洛茨基。有時通過討論蘇聯史達林所進行的政治反革命及其在中國的發展也使得全面地討論托洛茨基主義的影響成為可能。史達林式官僚制度在蘇聯的錯誤政策究竟有哪些？而由此對當時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到底有什麼影響？它又是如何導致中國 1925-1927 工人革命的失敗？毛澤東是如何從依靠城市工人階級倒退回依靠農民階層的？為什麼說中國 1949 年的革命並不是由工人階級領導的革命？等等諸多問題。但是這並不意味著真正的馬克思主

義已經完全不復存在了。我解釋了托洛茨基在俄國十月革命中所起的作用，尤其是他的領導作用，他是如何與列寧同志一起在 1917 年高舉起革命的旗幟。同時我也解釋了托洛茨基對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革命和世界革命之間的關係的論述和他所持的觀點。

所有這一切是我跟學生所討論的實質內容。不過，在這些討論之餘，來自上海的學生把我帶到天安門廣場中心的人民英雄紀念碑前；這是所有的學生運動領導人及西方媒體記者所在的地方。在那個特殊的日子裡，我遇到許多學生領袖。我不得不說的是，相較與其他基層的學生，他們對政治理論缺乏興趣。這並不因為他們的生存條件與普通學生有什麼不同，更多的因為他們正在領導一場「戰鬥」。他們更感興趣的是，我是否可能資助些金錢，贊助帳篷；或者如果一旦有人入獄，可以通過我與西方勞工運動組織的關係網絡實施國際聲援；他們更多的是關注諸如此類頗為「實際」的問題。

我必須補充一點，在學生中存在一些半自覺的政治意識，如學生領袖可以被更換，生活條件也不比其他普通學生好多少，在行動中表現的往往比大多數學生更積極。這些領袖們確實非常勇敢。首先，很多學生領袖都進行了絕食。我遇到的一些學生領袖是最早組織絕食行動的。有的因為絕食遭受腦損傷。其中有人因此留下後遺症，說話像個孩子，這很可怕的。

我與這些因為絕食大腦受到損傷幾乎成為植物人的學生英雄進行討論的時候，他們基本還可以交談，但控制力很差，顯得非常不安、緊張，經常會跑題。他們的健康將難以徹底康復。我不會說任何一句任何學生領袖的壞話。因為其中很多人現在已經死了。他們是真正的烈士、真正的英雄。很多人都知道，只要他們決定帶頭領導運動就相當於簽署了自己的死刑判決書，他們清楚地知道自己身上會發生什麼事情；他們是精英，是除了馬克思主義者之外不會在外面世界存在的精英。非常慶倖能夠遇到這些同志們，這全是因為他們的英雄壯舉的感召所致。

順便說一下，當時並不存在一個單一的學生組織領導學生。即使在紀念碑前，也有五、六個不同的學生團體。在這次學生運動的早期，一些領導人都是非常活躍的共青團幹部和成員。起初，他們將運動看作是支持趙紫陽與「強硬派」的鬥爭。但這種設想卻沒有長期持續下去。在我到達廣場之前，這裡已經被更激進的團體所取代，他們想留繼續留在廣場替代了想要離開廣場的政治團體。他們同意，理論上就需要一個整體的學生組織統一協調。但是在沒有理論和綱領的情況下，要彙聚起來難上加難。事實上隨著運動開始退潮，在不同的群體中真的發生了一些衝突，但不是政治上而是在分配帳篷和錢物等方面。

對理論的渴望

在之後的幾天裡，我還與學生領袖們進行了進一步的交談，許多談論就在帳篷中展開。一次又一次的討論，我正在經歷我在西方世界從來沒有經歷過的政治工作。我只要走進一個帳篷便可以開始討論；而一旦我表明自己的身份，馬上就有人聚在我的周圍；給我提供清涼的飲料、香煙，有的還熱情地拍拍我的後背，有的還把我當成歌星似的索要簽名！但這絕對不是「認識一個西方人挺好」的奉承，而是因為「你是我遇到的第一個西方的社會主義者，非常有幸能夠認識你」。當然，真正感到榮幸的是我，不是他們！我不想說的太過誇張，假如簡短的用一句話來說，只要是學生們關注的問題，他們非常渴望能得出相關的政治理論。在接下來的一遍又一遍的討論中，最終我們對今後的思路和努力方向達成完全一致。有一件事值得一提，可以看得出這些學生具有很好的文化修養。在他們中間，沒有粗話、沒有毒品、沒有酗酒、沒有性別歧視。在廣場上，男女學生並排躺著休息，也沒有衝突和騷擾。人的性別差異在此得到充分的尊重。

在星期二的晚上，有些學生為我組織了一次在學生領袖們的會議上的講話。在那次會議上，我很榮幸能獲得一枚天安門廣場的紀念徽章。這種徽章的數量非常有限，是專門為那些做出英雄壯舉的學生們定制的。對他們來說就像相當於大英帝國的維多利亞十字勳章一樣。對此，我感到非常的榮幸能夠獲得這麼一枚勳章。不少我曾經會晤的學生還

沒有得到一個，我覺得他們都有點嫉妒了！這枚徽章將是我生命中永遠的一部分，除非有人願意給澳大利亞戰鬥派的政治基金提供 1000 澳元，那麼也許我會考慮轉讓；否則我將永遠地保存好它。

獨立工會

星期一晚上發生的事情影響是巨大的。有學生對我說：「你為什麼不來跟我們一起來，我們會給你介紹一些要組建獨立工會的工人」。於是，他們帶著我穿過天安門廣場到達紫禁城。我不知道你是否曾經看過電影《末代皇帝》，電影描繪了紫禁城作為中國皇帝們進行政治統治的象徵。我現在被帶到這裡，這是一個龐大的上了鎖的大門，約有 10 米高，門前聚集著一些工人而非學生，他們望著大門試圖進去。在門的另一邊，有 6 名工人手持棒球棍，就像一隻小小的守衛大門的工人武裝。他們後面有三十多個工人領袖力圖籌組中國的獨立工會 他們認為這將是波蘭團結工會式的獨立工會。

我的嚮導兼翻譯和我用從學生那裡獲得的一個通行證穿過眾多想進入的工人一直走到大門前，那些工人民兵非常嚴厲地盯著我們。大概他們把我當成想從這裡獲得爆料的記者了！但當明白我們的真實想法，他們打開了大門，後面想跟著我們一起進入的工人們卻被他們擋在了外面。中國工人組建獨立工會運動的熱情如此強烈，他們積極關注著會發生什麼事情。

順便提一下，人們進行討論的政治熱情可以讓我們知道到底情況如何。僅僅走在街上，你會發現一堆人聚集在一根電線杆周圍。起初我覺得非常奇怪，這些人看著電線杆幹嗎？可是當你走到跟前的時候，你會看到貼在電線杆或者燈柱上的地下報紙，每個人都在閱讀這些地下報紙，特別是在前面所述的遊行途中的時候。這簡直就和你讀到的 1917 年俄國革命時候的情形一模一樣。整個情形令人震驚。任何拿著傳單出來的人都會被人關注。這就像你在悉尼的大街上舉著一張 10 元的紙幣一樣。我的意思是每個人都可能從你手中把報紙搶走。人們幾乎閱讀任何他們可能接觸到的資料。我碰巧有一張香港的資產階級報紙，雖然它已破舊不堪。但人們仍然向我索要上面的照片，這顯示出人們對資訊和思想的渴求。

我們到達紫禁城。……當這些工人領袖一瞭解我是誰，來這裡是幹什麼的，他們立即就變得非常地狂熱。我從未見過這樣的景象，甚至比學生的反應還要積極。他們一直在說：

「這簡直是太棒了」。他們立即拽過來六個椅子，讓我和翻譯還有 4 名工人領袖坐下。這不是官僚制度的原因；而是因為與學生相比來說，紀律更顯嚴明，他們堅持只有 6 個人能夠參加那次會議……之後我才可以對其他三十渴望聽到的工人朋友們交談。其他的工人對此表示出十分不滿，有兩個人因為不允許面對面地參加我們的討論，當時甚至傷心地要掉下眼淚。

這些工人領袖跟學生們比起來有一個差別，就是他們每個人都做筆記。他們每個人都拿著筆記本，記錄下我所說的每一句話。（因為與學生相比來言，他們會講英語的人更少一些；所以我說的比較慢，然後再由翻譯翻譯出來）。我們不間斷地討論了 3 個小時，主要集中在波蘭團結工會問題的教訓上。因為這些工人們聽得非常認真，他們很快就抓住了我說的意思。

「基本上，你所說的主要意思是我們要推翻中國共產黨」，他們說到。他們領會的速度遠遠超過學生們。這不是說要貶低學生，但從工人階級在社會的作用和性質等方面可以得出的這樣的結論。儘管他們中的大多數擁有家庭，但他們已經完全把他們的家庭置之度外。

一名工人告訴我，他把他的 80% 的工資用在獨立工會的運作上。他說：「這就是我的生命」。我說：「這意味著你對未來的投資」。他說，「你描述的很準確」！這讓我想起一些來自南非的報告，那裡的工人們將獨立工會視作是

他們擺脫種族歧視和資本主義的唯一途徑。

與學生一起很容易就一些基本觀點達成一致，甚至是對於整體的綱領達成一致。而與工人在一起就不同了，一旦談到推翻共產黨組建一個工人和學生的政府的時候，他們不會輕易聽信對方，除非他們完全相信我是在認真談論這個問題。因為對於我來說這是很容易的，我來自海外而且只是口頭說說而已，但對於他們這些必須去實踐它的人而言是截然不同的。所以討論的問題一次又一次回到原地，回到在中國共產黨的統治下他們的要求能否實現的問題上。他們需要被說服，直到確信這根本是不可能的。這並不是很容易解釋清楚的，尤其是在面對波蘭的團結工會這樣一個明顯的教訓。但我們進行了三個小時非常激烈和有意義的討論。

在討論行將結束的時候，他們說：「明天我們就要組建我們的工會。你能否來參加成立大會並發表講話？之後我們可以回到紫禁城繼續我們的討論。」我認為這是個很好的主意，為了表達我們的團結與支持他們的發展，我會回來與三十個工人領袖進一步探討今後的發展。之後我離開與學生們展開了更多的討論。

第二天當我回來的時候，前一天晚上我們曾經進行談話的四位工人領袖中的三人已經被捕了，連同他們的筆記本也被沒收了。說實話這讓我真的有些擔心！為什麼他們會被逮捕？事實上，在那些日子裡，官僚體制內部一直在討論下一步採取什麼行動。「我們應鎮壓這場運動？派駐軍隊？還是讓它自生自滅？」就個人的觀點來看，我認為這是因為中共上層覺察到了要成立獨立工會的苗頭，他們也從波蘭的團結工會事件中得到教訓，預知到這樣做下去局勢會急速發展難以控制。這就一個是轉捩點！當他們決定開始行動的時候，他們會說，看，我們必須干預這事，我們必須保持穩定。所以說，逮捕那些三名工人領袖絕對不是巧合，因為在這一階段還沒有學生們被捕，至少就北京而言是這樣。但這些工人被捕確實太快了，這是因為中共上層覺察到這可能帶來的結果所以立即採取了行動。

週二當我到達紫禁城的時候，他們告訴了逮捕的消息。顯然，我能夠做的只有聯繫國際社會舉辦聲援行動以爭取早日釋放這三個工人領袖。順便一提，他們三個人於第二天就被釋放了，儘管他們中大多數在以後（大屠殺）中被殺害了。我將在後面提及相關的具體情況，事情發展超越了我们所能設想的。當我在傍晚再次到達紫禁城的時候，每個人都在打點行李準備離開。我問：「會議的事情怎麼樣了？」他們回答說：「會議不會在這裡開了，我們會到路的另一邊去開會。」我說：「好的」。我們坐在那裡呆了幾個小時，直到天色開始慢慢變暗，大約晚上 7-8 點鐘，我們穿過紫禁城重新回到天安門廣場。這已經是下班的時間了。在過去的 24 小時裡，今晚將要成立的獨立工會的海報已經貼遍了北京城。因此，當晚九點大約有 50 萬人聚集在天安門廣場，我要說明一點，這裡面大約有 40 到 50% 是工人。

五十萬人

我們向前走，一直走到人民英雄紀念碑下面。從那裡可以看到廣場上的一切。你能夠看到你面前的 50 萬人，他們充滿著對思想的渴望，對組織的渴望，對於引導他們前進的道路的渴望。這是如此一個壯觀的場景：50 萬人擺脫了日常生活的枷鎖，拋棄了所謂養家糊口的羈絆，靜坐在那用政治手段爭取他們首要也是最為重要的利益，真是難能可貴。天慢慢黑了下來，有人用閃光燈拍照，也有人點燃了香煙，望眼一看到處是閃閃的亮光。

這時你感覺到自己如此渺小，此時佇立在你面前的；就是工人階級的力量，或者說是潛在的工人階級力量。由此可以推知，如果這次運動能夠與馬克思主義思想結合起來，地球上沒有任何力量能夠阻止它。

在會議開始前，社會各界人士團結地走到一起進行聲援：一名僧人、一名本地的流行歌手……最值得關注的是，還有一位 98 歲的老太太，非常的柔弱；她曾經參加過二萬五千里長征，並且見過毛澤東本人。在人群中顯得非常突出，尤其是這場運動將會受到鎮壓的趨勢越來越明顯，（雖然沒有人預料到鎮壓會如此血腥）。翻譯把她的演講簡要地告訴給我。她說，她曾經把她的生命獻給了 1949 年的中國革命。今天她站在這裡無法高興起來，因為解放 40 年

後人民還不得不為生存而鬥爭。但她不得不這樣做。她說是同學們的精神激勵了她，她感到她自己與學生們在一起，雖然她很快就會死去，但鬥爭必須繼續下去。說實話，我被老太太的行為和言語感動的熱淚盈眶。大家給予老太太熱烈的掌聲。

晚上 10 時左右，會議正式開始。我簡單介紹一下背景。北京各地，尤其是在市中心的區域，政府在所有電線杆上裝有高音喇叭。特別是自運動開始時，全天不間斷地進行播放，他們不停地播放新聞社論，這如同電影《1984》描述的情況一樣。他們用聲嘶力竭的語氣宣稱目前的情況是「社會餘孽」、「極度混亂」、「反革命」等等，但與此同時你可以看到在你面前的是世界青年和中國的工人階級中的精英分子，他們在為爭取真正的社會主義而進行鬥爭。在廣場上學生也有自己的廣播網，他們用大喇叭大聲地播放《國際歌》。仿佛在說：「這些都是謊言，我們不是反革命，我們真正繼承了國際工人階級運動的傳統。」

工會的成立

在大約 10 點，工人領袖站起來面對嘈雜的人群大聲宣讀了工會的訴求、成立的原因和章程等等。我是第二個發言人。我站起來表示聲援工人，代表那些在過去數幾周為北京和中國各地發生的運動所感動的世界各地的工人和學生們。然後，我粗略地強調了一下學生們下意識中已經提出的綱領：爭取選舉的權利、罷免所有的官員，所有官員必須與工人同薪等等。

繼而我又轉到中國共產黨政府的問題上來，我說任何「共產主義者」或者任何自我標榜的「共產主義政府」只要其逮捕工人，無視工人的民主權利，就不是真正的共產黨。我說，中國真正的共產黨人，就是那些堅持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主義傳統並支持這場運動的共產黨人。我可以告訴大家，這個聲明反響非常好，這就是人們迫切想要聽到的。我講了約 10-15 分鐘。氣氛很好，之後又有兩個人上臺發言。

人們並不希望聽到：「你們應該走西方式的道路」或者「我們西方已經取得了很大的民主權利，這條路是你們必須要走的」。一名學生向我提問：「你看，如果我們走資本主義的道路，就會像印度一樣，而不會像日本。我們有 10 億人口。如果資本家重新來到中國，他們會在經濟上進行殘酷的剝削。我們不會對此抱有任何幻想。」

西方的媒體記者製作了不少關於學生們把「民主女神像」豎立在廣場上的宣傳。但同學們說這並不是支持美帝國主義或者想要回到資本主義的道路上來的象徵。它標誌著支持民主權利。而且不少學生對於在此設立這個塑像也有過懷疑。他們對我說，「如果我們這一切發生在南美，我們認為不會運作得這麼好。」當民主女神像被豎立在天安門廣場的同時，國際歌也在全天播放著。我想關於學生們是否想重新回到資本主義的道路上來，大家應該是沒有疑問的。

而這正是因為計劃經濟體制所帶來的成果。譬如中國的公共衛生服務體系——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舉一個小小的例子，你可以花上整整一天時間在北京動物園逛上一圈，這也許是全世界上最好的動物園，但門票錢只要 1 澳分左右。地鐵、公共汽車和房租等等都很便宜，幾乎就像免費的一樣。雖然仍然徵收費用，但只占工資收入的一小部分。但由於通貨膨脹導致食品和衣服價格的飛漲對於普通工人階級而言是一個大問題。

一位學生對我說：「我們瞭解西方，我們並不愚蠢。我們知道只有少數西方國家，如日本、澳大利亞、英國等生活比較富裕。即使在美國黑人也受盡了折磨，而且美國也存在很多失業。我們知道，在所謂的西方資本主義世界中，大多數人生活在非洲、南美和中美洲等國家。」人們知道發生了什麼。他們要維持 1949 年革命所帶來的巨大成果，換言之也就是國有化和計劃經濟體制及其帶來的文化、社會和經濟效益。但他們認為這些好處局限性很強，中國人所具有的無限潛力和優秀才能被中國的官僚統治所湮沒。

資產階級記者看到中國的工人太「懶惰」，因為中國存在很多人浮於事的情況。但我還想說的是，即使麥當勞中

比較努力的員工來到中國來工作也未必會不懶惰。但這不是什麼「冗員過多」或者說中國人是「天生的懶惰」。事實上，每個人都有一份工作，正是計畫經濟所帶來好處，雖然中國政府中所謂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派」試圖終結保證就業的狀況。

如果當你知道無論你怎樣做，你也不會得到更多的好處，你還會繼續努力嗎？政府理應是人民的政府，而當你卻發現自己根本沒有發言權。這一點與為資本主義的企業沒有一點不同。

在這裡即使你工作很努力，並且在下午兩點完成了你的工作，假設只有下午五點鐘才能下班，你不可能被允許提前三個小時離開的。你必須又要額外付出三個小時的勞動。不幸的是在這些所謂的「社會主義」國家就是這麼工作的。這就是為什麼現在生產積極性與解放初期根本無法比擬。正是因為政府的官僚所致，而不是人民的原因。並且他們自己也很清楚這一點。

早先的政府媒體，也表明由於官僚主義自身的管理素質實在低下，管理不善和腐敗問題嚴重而影響來自海外的投資。當它們試圖獲得廉價的原材料，公司會來投資，但將貨物從一省份轉移到另一個省份的時候卻和封建時代沒什麼兩樣。國家的統一是資產階級革命的一個歷史性任務。但基於史達林主義，中國革命還未做到這一點。貨物從廣東運送到北京，你要經過幾個省份，經歷不同的稅收系統。你必須填寫一式三份的表格。如果您想在北京購買一盒火柴，你也會得到一式三份的收據。這簡直是瘋狂的官僚主義行為。即使在殖民地國家也不會這樣。

「僅在一個國家實現社會主義」這是對經濟的扼殺。你可以通過報紙上一位上海學者的文章得出這一結論。他是這樣寫的，看看西伯利亞，它需要開發，但是蘇聯工人都不願意去西伯利亞；他們必須得到三到四倍的工資才會去。而我們我國東北地區以及北京都存在過剩的勞動力。他們願意去西伯利亞的，因為即使只得到一半蘇聯工人的工資，他們的收入也會超過現在在中國的收入。當然，我們本來就是兩個國家；戈巴契夫來訪也討論過這個問題，其實，這就是他的提議。但在現有的官僚體系統治下這是不可能實現的。

恐龍型政府

來自新聞報導的其它稿件不斷地抱怨中國污染的程度，情況非常令人絕望，尤其是北京，因為它是一個內陸城市。

他們把責任歸咎于官僚作風，這確實很重要。所有這些事情都令人非常失望，知識份子和學生反應更加明顯，反映了更深刻、更廣泛的和自發的一種情緒。一切都正在發生變化和改革開放也正在進行，全國範圍內的遷徙已被許可，人們可以去海外學習，但他們仍像文化大革命一樣被相同風格的政治官僚所控制，陳舊的政治體制伴隨著非常先進的科學技術，這種結合以及不平衡的發展隨處可見。在北京，尤其是上海，你會感覺像是在倫敦。夜總會和餐廳不亞於任何西方大城市。但頂層的恐龍式政府總是生活在過去，例如他們會說：「有上百萬人犧牲」或「新的一代已經忘記了長征的精神。他們從沒有解放中國，江山是我們這一代打下來的」。

在政治和經濟之間有一個總的矛盾，並且對知識份子有很大的影響。當人們看到蘇聯、波蘭和匈牙利等國在政治上開放，他們會說，好的，我們也要這樣！這不是一場自下而上的抵制經濟退化的運動，這是一次知識份子開始的運動。這也是為什麼要花一些時間讓工人們意識到投身到這場鬥爭中去對他們來說是很重要的事情。

當然它得到社會各階層的大力支持，這不僅僅包括廣大工人，而且包括了更廣泛的階層甚至包括龐大的官僚階層本身。有個例子，我到的那一天，遊行隊伍中有一支隊伍就是來自於官方的《人民日報》，這是世界上擁有最廣泛讀者的報紙。這份報紙報導每天都發生的事情。為了逃避檢查，記者以這種方式開頭：在天安門廣場，今天發生了一些非常糟糕的事情。

然後他們詳細描繪到底發生過什麼事情，最後他們加上一句：「李鵬總理說，這是令人不能容忍的！」他們從遊行的人群眾得到了一些很好的反應。形勢的發展被甚至以不插評論的方式在政府電視臺播出。通過這種方式，其他城市甚至農村的人，都能看出事態發展趨勢。但最有效新聞傳播的途徑還是「叢林電報」（口頭傳播），我們在澳洲這樣稱呼它。城市居民在國內旅行很少受到限制。列車上坐滿了要去或者從上海等地而來的學生。

但除了所有這一切，工人階級還沒有走到運動的最前沿，甚至沒有以罷工的形式為這次運動留下他們獨有的印記。我到達之前，這次鬥爭發展到最高點時，工人們走出自己的工廠，上街進行遊行示威。但即使這樣也沒有進行一個有組織的罷工。在大屠殺發生後第二天，有人號召發動總罷工，所有的交通被阻斷了。飯店工人們出來了，但建築工人仍然在工作。至于工人所關注是，他們擔心如果參與這項運動又沒有勝利的保證，一旦失敗了他們將失去現有的工作。這是我和工會領袖討論時他們提出的一個問題。

工人們的情緒

工人們也有這種擔憂，運動遲早要走向結束但目標仍然十分模糊。「我們同意學生對民主權利的要求，但他們其實並沒有談論到權力。此外，我們並不確信，如果我們站出來，那麼在今後的工作中，我們是否會仍然由以前一樣的壞頭頭來領導我們，對於整個社會而言也是如此，未能真正地擺脫共產黨的官僚體制。」這是工人們在思索的事情。除非堅信情況會有所變化，否則工人對是否加入獨立工會也猶猶豫豫。

而事實上，在過去 10 年的經濟改革中，有著相互矛盾的影響。部分職工從中受益。例如，至少在北京或上海這樣的城市，沒有消費品短缺，從小轎車一直到外國香煙，這一點與波蘭截然不同。此外，有種體系曾經讓官僚和外國人有特殊的不同于一般老百姓使用的外匯券，但這體系一而再、再而三地正在被打破。如果你乘坐計程車坐，你要付外匯券，他們可以用這些外匯券去購買消費品。

同時，給運動積極的支援多是收入較好的職工。比如說，獨立工會的創始人就大多來自相關高收入的行業。大概這使他們感到更自信，但同時他們的收入也被通貨膨脹所抵消。讓這些工人們再回到過去那種嚴格的中央集權和文革式的壓制是不可能的。如學生們說的，我們已經進行了「經濟體制改革」，接下來要進行的民主政治體制改革會是怎樣？當然還是計劃經濟基礎上的民主。

假如獨立工會在一個月甚至在兩個星期之前成立，它發展勢頭會非常快。學生們已經給了工人們信心。但它目前建立的時機是學生運動開始衰退的時候。廣大的工人感覺大勢已去，沒有足夠的信心積極參與進來。但下次如果運動爆發，毫無疑問，一個獨立工會將會在運動開始時就崛起。

上海

歷史性的會議後的一天，（此次會議非常具有歷史意義，因為它是中國自 1949 年革命以來成立的第一個獨立工會），我到達上海之後，在那裡我和高校大學生進行了一些非常精彩的討論。

我需要就學生們的生活方式說明幾點。你可能會有這種印象，中國的學生從某種意義上是特權精英組成的，他們投身運動並不是因為對自己生活境況不滿而是因為對現實社會的不滿。這是一個錯覺。上海大學的大部分學生所居住的大學校園和宿舍的條件是非常糟糕的，10 人一個寢室，沒有地毯、也沒有瓷磚，只有水泥地面和水泥牆。有的地方甚至連油漆也沒有。暖氣那就更不用說了。他們得到的食物味道很不好，我的意思是你僅僅是可以吞下去，但味道確實很難吃。政府給他們的助學金非常少。學習的過程中，他們經歷了很多經濟的困難。所謂的特權就是能夠在大學有這麼一個學習的機會。

傍晚學生們為我舉辦了一次會議，其中還有個絕食者第二天要去北京。這是一個足有500人參加的會議，四周環繞手持棍棒的學生，因為學校的管理層已取締了這次會議。我概述了中國的鬥爭和其它史達林主義國家鬥爭的聯繫，如波蘭，南斯拉夫和蘇聯等國。學生們的國際主義被激發了出來。我把他們的經驗體會加以國際化的描述，其真實的反應也會顯現出來。他們對倫敦或紐約中國大使館門前的燭光守夜興趣不大，他們需要的是思想，需要有人能指明運動發展方向。只要海外的朋友們能夠關注他們就感覺很大的滿足。至少那是我從他們那得到的印象。

儘管我當時還不知道，在我講述我的觀點的時候，僅僅是在一個500人的秘密會議上，但演講其實正通過學生電臺向5萬大學生直播！第二天，我很快就回北京。週六，大屠殺的前一天，我又回到天安門廣場……。像以前一樣，那天我和不同群體的學生們就以前類似的內容進行討論。

週六，6月3日

晚上的時候，我回到紀念碑前，就是想坐一會。這是一個溫暖而美妙的夜晚。周圍有成千上萬的人。這是一個週末的晚上，大家都有一點休息時間。明天將是新的一天……。工人們總是週末出來。一切似乎都是那麼美好。傍晚時分，空氣變得有一些緊張。學生立即派人聯絡那些「待業青年」，學生們通常稱這些人是「監獄外面的鳥」，他們支持學生，只是有些粗魯而衝動而已。他們是一群很棒的小夥子！事實上，他們手裡只有叉子和棍棒，就在我身邊坐著，但不會說英語。其中一個青年給了我一瓶水，我喝了一口……。怎麼跟愛爾蘭私釀威士卡似的，這根本就不是水，這是迄今為止我喝過的最烈性的飲料！本來以為是水呢，我竟咕咚喝下去了。還好我沒有咳嗽，也許他們會想，「甬說，這哥們可以啊」！

與此同時，發生了幾件事，讓我和一些學生感覺到今天晚上要有什麼事情發生。首先是政府曾派特工進入了廣場。如果中國政府現在在鎮壓上還不夠成熟，如果你看過《大遊戲》或《逃亡夜》，或訪問過東德，你就會知道，鎮壓是赤裸裸的、血腥的。舉例來說，這些特工都穿著綠色卡其布褲子和白色襯衫！他們明顯按指示分開進入廣場，但廣場上的情景使他們感到恐懼而聚集在一起！事情的經過是，學生們將他們抓起來，並拖到人民英雄紀念碑前揍他們。學生們不會殺死他們，只是對他們拳打腳踢。然後，學生們就會把一個麥克風放在他們面前，你會聽到「嗯，嗯，嗯，嗯……哇……很抱歉，我並不想這樣，我是被迫來的」。學生們再給他們一頓狠揍，然後讓他們滾蛋。這倒是一個不錯的策略。

廣場上的學生和工人們都沒有武裝。在過去幾天和幾周內，軍工廠罷工的工人們曾提供槍支給學生，但是學生們拒絕了。就在週六，因為27軍正在從西郊向北京市區進軍，兩輛裝滿了武器的裝甲運兵車停下來要為學生提供武器，學生們再次拒絕了。學生只有棍棒，少數學生也有手槍，他們將自己看作恐怖分子要槍擊李鵬。他們不願意與其他人分享他們的槍：這似乎是一個特權，有槍似乎是一件讓人感到自豪的事情。而實際上他們也只有6、7發子彈。

大約下午五時，天還沒有黑，約有三千名軍人開進了天安門廣場西邊的人民大會堂。他們佔領了這座建築物。他們裡三圈外三圈的團團坐著。大部分人是手無寸鐵的，但有些在中間的士兵是有武裝的。學生們圍著他們並與他們討論，事實上交流進行的非常好。有些士兵哭了，並說道：「我們並不想來這裡」。

必須指出的一點是，中國軍隊的構成完全是一支農民的軍隊。在中國歷史上的任何一個時期，這都是一支農民的軍隊。例如，在一個上千人的工廠，只有3個人會被徵召入伍。所以，如果你是一個工人卻被徵集當兵那是活該你倒楣；如果你考上了大學，你就十有八九不會被徵集入伍了；但大多數農民要當兵，因為服完3年兵役後，他們就會被允許留在城市，對於普通的農民來說這可不是件小事。所以，即使是當時的「北京衛戍區」，也是指從首都周邊來的農民，沒有多少是來自北京工人和學生。

這是一種有意識的官僚政策，把軍隊的基礎建立在農民中而不是工人中。但即使如此，幾次沒有武裝的士兵們進

入天安門廣場並試圖清場時，這些來自農民的軍人回應包圍著他們和車輛的工人和學生的訴求，也只是勸說他們趕緊離開。

兇殘

週六晚上，一位學生從西城跑回來，說帶著催淚彈的士兵們已經開進來了。再加上前一天一輛軍車撞死了三名學生，空氣一下子緊張起來。一名學生開始向士兵們投擲石塊。這是我第一次看到了野蠻的景象，而幾個小時以後我又一次看到。

一群士兵沖進了失控的人群，並抓獲了這個學生，他被押到 3000 人部隊的中間。他們剝光了他的衣服。天氣仍然非常炎熱，32 攝氏度。他們用木制拍子打破了他的頭。他仍然站在那兒。他們確定他還能站的住，結果就把他的頭骨打裂了。他只是站在那裡直到流血過多而死亡。約兩小時後，他倒下死了。這是很恐怖的一幕。他被迫站在那兒，全身赤裸，鮮血從他頭上的傷口流著直到他死亡。

但在這一階段，工人和學生們仍有信心。我必須說一件事，工人的獨立工會計畫接手策劃。他們拿著這座城市的地圖討論著：「部隊在這裡，部隊在那裡……我們應派遣大批工人去這裡，去那裡……年紀大的女工（在與部隊的辯論並阻止他們開槍時表現最好）應該派到那裡，因為這些都是最殘暴的部隊，跟他們將會有更多的辯論。」隨著深夜的來臨，他們接手了這些學生的工作。他們的想法似乎是：「現在這是我們的戰鬥。學生已經發起了這場運動了，這是很了不起的，但現在該由我們來領導了。」但同時，獨立工會還處在萌芽階段。

因為成立時間只有數天之久。由於它是在運動開始消退而不是一開始的時候成立的，不少工人仍害怕加入其中，也不敢進行鬥爭。但工會領導人盡力去做他們能做的，他們認為自己沒有背叛馬克思主義，也沒有攜帶武器。事情發生在午夜時分。27 軍從西邊開了過來，這不是北京的部隊。他們曾在越南戰鬥過，他們也曾鎮壓過西藏的民族運動，並曾駐紮在蘇聯邊界，這是一支習慣於殺戮的部隊。

你可以看到在幾個星期之前官僚們與指揮官們把這批部隊禁錮在城市外的帳篷裡，不讓他們讀報紙。只是對他們進行灌輸：「當你們進城後，你們面對的就是法西斯和反革命。他們會對你們說，你們是解放軍，不能向人民開槍，等等。但這只是一個騙局，這不是真相，這只是宣傳。」這樣部隊已經知道學生和工人會準備對他們說什麼了。戰士們就這樣被洗腦了。

還有傳言說，他們被注射了毒品。當然他們被告知，天安門廣場瘟疫瀰漫，需要注射防疫針，但這不是事實。戒嚴之前，官方報紙承認，在北京發生的交通事故和犯罪問題—當時北京基本上是由於工人控制和管理，或者至少部分如此—有明顯下降。戒嚴之前我在北京除了交警外幾乎看不到一名員警，交警似乎也是是多餘的，他們只是站在那裡，而學生在那裡指揮交通。也有傳聞說，這些士兵是被注射了腎上腺素。一位曾在阿爾及利亞戰鬥過的法國記者告訴我，當他們 24 小時急行軍的時候，他們都被注射了腎上腺素，這樣可以讓他們保持清醒和警惕，看來現在的這些部隊估計也是注射了這玩藝。

現在開始，如果我的陳述不是那麼流利，那是因為在上周我看到一些可怕的東西，那種恐怖的事情我絕不希望再看到一次。唯一的保證就是要使群眾運動與馬克思主義相結合。這是一個無法回避的問題。

午夜

午夜時分，軍隊開進了廣場，按照以下方式推進。先是有一些人投擲催淚瓦斯，接著有了同形式的催淚瓦斯。這些催淚瓦斯不只是使你的眼睛流淚，而是主要讓你的腹部和胸部難受。當晚，一些學生給了我一副催淚瓦斯面罩，我

感到很榮幸，我似乎在領取一枚徽章，因為實際上沒有多少面罩。我不想接受，但他們一直堅持，這讓我沒法說不。

在發射過催淚瓦斯之後士兵開始使用警棍。這是非常具有諷刺意味的：這些官僚們一面說學生們是親資本主義的，而政府是一個「革命的政府」，另一方面這些警棍卻來自臺灣。反革命的資本主義臺灣供應警棍給中國史達林主義政府毆打中國學生和工人。不只是用警棍，還有電棍。這樣，當你被擊中的時候，不僅是你的腦袋或身體其他部位受到重創，同時還會有電擊的感覺。

這是第二，第三步是持槍的士兵。接下來就是坦克和裝甲運兵車。與裝甲車一起的還有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帶有大型天線的美式吉普車，指揮官們就在裡面。此外，還有直升機，但我認為他們在晚上沒有什麼用，因為他們沒有探照燈。他們只是恫嚇人民。但第二天，如同政府所希望的他們開始變得非常有用。

用大客車組成的路障在下午六時沿著進入廣場的道路搭起來了。廣場上的人們一看到軍隊過來就把公車點燃。現在在北京市中心的每個街道都有一道一英尺半高的屏障。人們挖好這些屏障，將燃燒的巴士堆在路障兩邊。他們把道路挖開以獲取石頭。很多高層建築被學生們佔據。所有的磚塊已經被砸成兩半，這樣可以扔的比較遠。扔不動的大磚塊是沒用的。只有極少數的工人和學生有槍。

但是戰爭的前線是政治性的，前線首先是進行宣傳戰。即使攜帶催淚瓦斯的部隊來了，人們仍然跑向他們大喊「你不能向我們開槍，你們是人民的軍隊，你們怎麼可以射擊人民？」即使當天晚上，也發生了這樣的故事：一些部隊拒絕射擊，長官們卻威脅他們，逼迫他們開槍。因此，當它真的發生，當他們真的開始射擊，連我自己，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我都認為這是根本不可能的。這聽起來很幼稚，但在當時，當你親眼目睹一場大屠殺，那絕對是一個令人震驚的經歷。你周圍的運動裹挾著你，我周圍的運動讓我相信他們不會開槍。當它發生的時候，這真是一個巨大的震撼。

屠殺

他們只是在不停地開火，而人們一個個地倒下。永無休止似地身軀一具具的倒下。但人們再一次站起來，繼續向前推進，有時揮舞著紅旗，有時以磚塊還擊，而有時僅僅只是吶喊。人們會再一次地倒下，也會再一次地站起。而軍隊在向每一個人射擊。

我看見一個 3 歲的孩子，刺刀刺穿了他的胸部。我看見一名孕婦，被刺刀刺穿腹部而死，剛剛成形的男嬰就躺在她的屍體旁。他們做的這些極其野蠻。



我要說一件事。有一支半小時巡邏一次的車隊開過來了，沖過了學生和工人的路障。但他們是在下午時分在工人階級中列隊。所以只要他們一開始運動——所有的人都聚在一起，因為沒有一個士兵想被孤立隊伍的後面——成千上萬的工人就會跟在後面，他們手無寸鐵，還有一些女職工，其中有些人騎自行車。跟在隊伍後面的數千名工人沒法和他們作戰，他們只是唱國際歌。部隊後列的人不知道怎麼辦，他們偶爾會開槍，大家會趴下，但你不知道有多少人被殺，因為他們每次又爬起來，而死去的人卻躺在人群中的地上。就像沙灘上的海浪一次次地湧上來，他們只是唱著國際歌。

夜越來越深，人們越來越憤怒，他們開始沖著士兵高喊：「法西斯，法西斯」。任何說這場運動是反革命的人，其實只要在那裡呆 5 分鐘就足以明白真相。

連資本主義記者也不敢相信他們所看到的。但我必須說，雖然有些記者被嚇得逃走了，有些人卻很勇敢。比起改良主義的西方勞工運動的領導者，這些記者們更有良心。因為他們被報社從一個衝突中心派去另一個衝突中心，他們對發生的一切有一個國際的分析，他們看到了世界性的革命就發生在他們面前。但即使是這些人，其中一部分，還是不敢相信他們所看到的一切。

部隊到達天安門廣場，這場革命的中心，他們坐下來把天安門廣場包圍了起來。學生和工人被從北方、東方和西方三個方向包圍起來，只有南面可以逃生。部隊給了學生一小時的時間讓他們脫身。正是在這個時候，我離開了天安門廣場，有三名同學幫我從南方逃出來。

然後一大堆的學生領袖聚在一起，學生們組成一個方陣，就像滑鐵盧戰役中的步兵縱隊那樣穿過部隊。當然，在他們穿過軍隊的時候遭到了一頓痛打，但沒有一人被殺死。

還有一些工人和學生堅持留在廣場。軍隊將他們殺死。他們開槍將他們打死。他們只是向他們開槍。死者和和傷者躺在廣場上。然後坦克進來了，並碾過他們，把他們碾平，碾成肉醬。然後士兵們用推土機把屍體和帳篷收起來，所有的東西堆成一堆縱火焚燒。我確信一些人被焚燒的時候還活著，雖然我沒有拿到證據。而這些人將被官方煞有介事地宣佈為失蹤，而不是死亡。

這是星期日的早晨，直到中午北京的街道還有槍聲響起。大約 6 點左右，我回到了天安門廣場。我看到事情的另一面，因為這不是一場一邊倒的戰鬥。

巷戰

有一次，部隊對學生使用催淚彈。學生們逃開了，許多人試圖爬過柵欄。有 11 位學生沒有爬過去，坦克開過來，沿著柵欄碾過去把他們碾死了。當他們的屍體再一次露出來的時候，已經像火柴盒一樣平坦，他們死了。但那輛坦克與坦克群脫離了。工人們包圍了它，那情形就像一隻死老鼠上爬滿了螞蟻。他們扳掉坦克的蓋子，裡面有一名指揮官，而不是一個普通的坦克駕駛員。他們把他拖出來，毆打他，然後把他活活燒死，這些就像我們在 1984-86 年的南非起義中看到的一樣。然後他們將他掛起來向遠處的部隊示威，警告他們。事實上，一旦大屠殺開始後，人們試圖控制住士兵將他們分離開。但在這個階段，他們別無選擇，這時已沒有任何其他辦法。

我必須說，如果工人能夠武裝起來，如果再多幾個這樣的例子在這次鬥爭中早一點發生，事情可能會有所不同。我的意思是，不是哪一個士兵單獨被抓，不是哪一個特工單獨碰巧被派去天安門廣場被群眾所嚇呆。那樣的事情上沒多大用處。顯然，在這種情況下，打他們一頓，讓他們表示歉意，並就事論事的做一些宣傳，根本無濟於事。但是，當軍隊開始進行殺戮並開始象這種肆無忌憚慘無人道的殺戮的時候，這時只有進行強硬的回應。發生在眼前的一切到這時不是革命就是反革命，有些事情是不得不做的。

在這個星期日人群中瀰漫的情緒不是沮喪而是憤怒。但這是毫無意義的憤怒：「這怎麼會發生？」我的感覺一樣。我原本週一在廣場上有會議，我花了整整 6 個小時才確信天安門廣場在一夜之間就清理乾淨了，可這裡頭一天晚上還是世界革命的中心，怎麼今天就從革命走向了反革命，而眼前的天安門廣場成了 27 軍血腥的屠宰場。我認為自己是一個相對資深的馬克思主義者，親眼目睹了很多事情，看得很徹底！但我覺得自己現在像一個傻瓜，因為我花了六個小時去接受所發生的這些。我對人們說：「我可以肯定學生依然還在。我必須參加週一的會議」。人們嘲笑我說：「別傻了。他們已經死了。一切都過去了，都結束了。」

你能否想像中國工人和學生曾經把他們的生命和一切都投入到天安門廣場上的運動中。天安門廣場本身就意味著他們的一切。接著這一切又被無情地粉碎。而這一切都說明了思想的重要性。他們迫切需要一個對未來明確的分析和綱領，他們迫切需要的是明確的領導，遺憾的是，這一切都沒有發生。

當我跟著學生走在天安門廣場外大街上，我遭受了一點催淚性瓦斯的影響。現在，由於周圍的氣氛在急劇地白熱化，我感到一絲莫名恐懼的無助。如果與我說的有些許不同那我就是在撒謊。任何參加過戰爭然後回來說那是很偉大的人不是傻瓜就是在說謊。我們其實都很恐懼。但這個星期日上午的確是不平凡的上午。我們被射擊，我們被催淚瓦斯襲擊。但是因為我們周圍到處是屍體，因為我們感覺無比的憤怒，我們所有的人，當然也包括我，都將盡我們所能去做些事情。

前幾天與我一起進行討論的人中至少有 10 人已經死了。其中一個是女孩，前一天晚上我們還一直在討論「待業青年」的問題，她是 18 歲的少女，帶著一副約翰·列農式的圓眼鏡，穿著一身黑白相間的衣服——一個非常瘦小的姑娘。我們曾經在一起開玩笑、聊天。但是第二天，我看到的卻是她的屍體。

因為我是那時唯一的一個西方人，我有照相機，學生們領著把我從一個屍體走到另一個屍體。「拍下來。你怎麼看？回家以後你可以告訴人們這裡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事實上，一些學生給了我他們殺死的軍隊指揮官的銜章和他的鈕扣。這現在看起來有些奇怪，但在當時卻覺得沒什麼。大約幾天後，在我去機場的路上，軍人攔住了我們的車輛，我還以為……我當時攜帶著所拍的軍官被殺的照片，屍體的照片、以及軍官的銜章、一個催淚瓦斯罐以及天安門廣場的紀念徽章。所以，除了紀念徽章以外，其他所有的我都扔在路邊了）。

在屠殺的當天，走在大街上的時候，我還舉行了約六、七個街頭會議。每次我都說：「這一天，1989 年 6 月 4 日，將永遠載入史冊。每個死去的人都是為世界革命而死的烈士，他們永遠不會被忘記。世界上每個工人和學生都要吸取教訓，而這教訓極其簡單。在這個地球上的任何地方，凡是任何有思想的工人和學生，都不會再對所謂的中國共產黨政府抱有幻想。它再也無法宣稱自己是一個革命的政府。任何一個沾滿中國工人和學生鮮血的政府就不再是一個共產主義政府。它再也稱不上是一個革命政府。而從今天起，世界上的工人和學生們都要與中國人民團結在一起。」

人們對這一講話是反應非常強烈。有些人甚至企圖把我架在他們的肩上。這真的讓我真有些害怕！因為我們周圍還是子彈橫飛。但是那時我站在那裡告訴大家中國需要的是一個基於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托洛茨基主義的工人黨派，由此才能夠把革命深入進行下去。至少曾經對中國共產黨抱有的任何幻想都在這個夜晚永遠地消失了。

被撕毀的黨員證

當然，中國共產黨有 4700 萬黨員，占總人口的 5%。在這場運動中的不少學生也是共產黨員，大多是青年團成員。捲入運動的一些工人也是共產黨員。鎮壓後的第二天，我親眼看見兩名工人當著我的面撕毀了黨證。他們說：「由於政府昨晚所做的一切，我們再也不會相信它」。

中國共產黨跟東歐或蘇聯的執政黨是不一樣的。至少在大屠殺之前，黨內不少人士還認為中國共產黨是一個帶領社會全面進步的革命組織。就中國經濟而言，官僚主義只是相對地束縛了生產力，中國還沒有像東歐那樣對官僚主義形成全民痛恨。如果你是一名共產黨員，你不一定是一個頑固的官僚或者工賊。但是如今這種情況已經改變。我看到，任何學生或工人，只要對最近幾個星期發生的事件稍微有些常識，就不會再對加入共產黨進行革命抱有任何幻想。

這場運動的爆發意味著中國共產黨被架空了。在工廠和基層，共產黨有自己的組織，隨著運動的爆發，這些基層組織開始站在官方的立場上反對運動。但是，由於很多普通黨員傾向於支持這場運動，中國共產黨的基層組織變得渙散。從這個意義上說，它就像 1980-81 年波蘭團結工會事件發生時，共產黨也隨之崩潰一樣。現在將很難在地方一級以相同方式重新建立黨組織。新的共產黨將是一個純粹由惡棍和特務組成的「共產黨」。

當然，我們不能說對共產黨的所有幻想會就此一筆勾銷。如果像趙紫陽這樣的改革者能夠接手政權；在未來時間他也許可以享受一段民眾支援的「蜜月期」。但是，任何一個認識到這場鎮壓的人絕對不會再存在任何幻想。事情再也不會回到 6 月 4 日之前。這是中國革命的一個重大轉捩點，這就好比中國的 1905 年（譯注：1905 年俄國革命，沙皇對工人運動進行了大規模血腥鎮壓）。

此後一段時間巷戰仍在繼續，城市成了戰場。燒毀的卡車、燒毀的坦克、屍體鮮血遍地都是。週一總罷工的口號用血寫在牆上。人們的勇氣是難以置信的。當他們站在街頭面對催淚瓦斯時，他們希望知道我的想法。

當那些說「知識份子才需要理論」的人看到發生的一切，就明白這絕對是一句廢話，尤其是正在革命的人們需要革命理論。但是反革命的力量越來越佔據上風。整個形勢對工人和學生而言，越來越冒險，甚至對我自己來說也是這樣。這是一個頗令人沮喪的故事，我不想過多的談論殺戮和越來越一邊倒的戰鬥。

由此得出的一個普遍教訓是，在大規模的群眾運動爆發之前，需要一場建立在馬克思主義觀點之上的勞工運動。對革命而言，理論是最大的武器，它要優先於行動。武器、戰術、戰略、組織，相對於理論來說都是第二位的。當然，在工人階級軍械庫裡，槍械是致命的武器。但是，如果沒有正確的觀點，沒有政治指導，槍械如同任何別的東西一樣是不會被有效利用的。

一些資本主義新聞記者暗示：在不同派別的軍隊，38 軍(北京軍區)和 27 軍之間，會有一場對峙。我認為這太誇張了。誠然，38 軍曾經被認為是與「趙紫陽派」保持一致，與官僚中的改革派是一致的。當運動遭到鎮壓時，部分群眾也開始期盼「解放者」：他們希望 38 軍會進來「解放」這座城市。

38 軍被部署在這座城市的南部和東部的機場附近。但我認為，除非 27 軍不得不面對一場來自工人成功的反抗，除非工人鬥爭在上海這座中國最大的城市爆發，那麼鬥爭才可能繼續深化。只有在這種情況 38 軍才會開進北京，他們會被視為「解放者」；為了恢復秩序和維持官僚統治會解散第 27 軍。在那種情況下，李鵬、鄧小平可能不得不被替換，成為整個官僚體制的替罪羔羊。

但是，假如第 27 軍已成功地粉碎了運動，38 軍還有什麼理由開進來？他們的指揮官跟大部分的官僚一樣，跟大部分認同在西藏和其他地區的鎮壓的人一樣。他們只會對第 27 軍說，「好，這個工作你們已經完成了，但可不要認為你們現在官僚階層中具有決定性力量。

如果我們出來對付你，我們將得到全國人民的支持，你可能會得到應有的懲罰」。現在鄧小平已成功地穩定了局勢。他將採取一切必要措施，設法根除這一運動，維護官僚的統治秩序。會有很多很多的逮捕和殺害。對學生們來說，維持地下狀態的活動是相當困難的，因為他們很容易被識別出來。官僚機構會把學生的照片發到電視上，幾天之內就可以將他們逮捕。一部分階層甚至部分無產階級，在運動的初期會想，如果它贏了，我會支持它；或者至少保持中立，

現在這些人會轉而支持當權者，並會向當局通風報信他們身邊的那些人。如果在運動的全盛時期社會上有 99%的支持者，現在將是一個完全不同的局面。政府並非完全孤立。

如果有必要，「竹幕」將重新升起來。據報導，鄧小平說：「如果我們大家都被吊掛在街燈上，那麼外商投資怎麼辦？」除非是萬不得已，他們不會主動脫離外資。他們可能會走一段中央經濟集權的回頭路。但鎮壓之後，他們可能會設法給工人和農民一些經濟實惠。同時，也許最終還會有替罪羊。李鵬是不得人心的，即使在官僚體制內部也是如此。據傳，星期日的大屠殺發生後，他被自己的衛兵兩次擊中腿部。即便是一個成功的反革命政權也無法通過一個最討厭的人物統治 10 億人民。短期內除掉他並不符合他們的利益，但在某個階段，我想他會靠邊站。

我相信全世界每一名工人和學生的心與已經飛向了中國，飛向那些過去幾周裡在中國做出最大犧牲的人們。而對那些世界革命中死去的勇士們最大不敬就是讓他們的犧牲白白浪費，沒有在下一次的戰鬥中從他們的死亡中汲取任何教訓。

如果鄧小平認為在 27 軍的幫助下——這個地球上此時最讓人憎恨的一群士兵的幫助下，他就可以統治占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的 10 億中國人，那麼他就犯下了天大的錯誤。沒有任何辦法可以阻止這樣的運動不會再次爆發。它可能需要一些時間，但它一定會再次爆發。

一個國際馬克思主義者的工作就是要確保汲取教訓，確保在下次鬥爭爆發的時候，馬克思主義觀點可以用來武裝發生在這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中的運動。這樣我們就可以說，這些同志沒有白白地死去。未來幾年後，中國成功的政治革命會是什麼樣子？1989 年其實是真正的第一步。就想俄國 1905 年革命之後一樣，中國在未來幾年勢必會有一場成功的政治革命。

斯蒂芬·喬利 (Stephen Jolly)

1989 年 6 月 13 日



中國群眾運動大事件年表

1919年5月4日：在天安門廣場上，北京有3,000名學生進行示威，反對凡爾賽條約的規定和而要在中國發展「民主和科學」。

1921年：由「54運動」所培養的青年人組建中國共產黨，他們為俄國十月革命所激勵而開始在中國建立以民族解放為基礎的工人運動。

1925-27年：中國工人階級的革命運動，中國共產黨在史達林主義控制之下的共產國際影響下，放棄了對由蔣介石所領導的「民族民主」鬥爭的領導權，這導致民族主義者殺害了他們共產主義的「盟軍」並粉碎了工人的運動。此後工人運動失敗的中國共產黨將力量轉移至農村地區進行遊擊鬥爭。

1944-49年：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指揮的遊擊軍隊控制了政權。雖然聲稱要執行「100年資本主義制度」，但他們被迫採取國有化生產資料手段以確保民族國家獨立。但由於沒有工人階級的有意識的積極參與，導致一開始權力就掌握在官僚的史達林主義的獨裁者手中。

1958-60年：「大躍進」。試圖由極端的集權化政策在中國大力發展工業。大躍進的失敗和由此導致改革派官僚鄧小平和劉少奇降低了毛澤東的聲譽。

1966-76年：「文化大革命」。由毛澤東所引導的大規模青年運動將他們控制在「紅衛兵」的體系內以消除官僚體系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改革派而促使進一步強硬的中央集權化，封閉的自給自足。而最終紅衛兵運動也被軍隊鎮壓下去。

1976年：毛澤東的逝世鞏固了由周恩來、華國鋒和鄧小平領導的改革派。由毛澤東妻子江青領導的「四人幫」因為「文化大革命」而被審判。

1978年：「民主牆運動」。最初由鄧小平所鼓勵的以學生為主的大規模青年運動以反對所謂「左派」官僚和支持民主政治。然而，運動超出了「改革派」官僚的控制並且威脅到了整個官僚主義體系。因此鄧小平鎮壓了運動並監禁200名參與者。

1986年12月—1987年1月：學生的新運動。中共總書記胡耀邦被鄧小平逼迫辭職而且隨著經濟發展減緩，反對中央集權的改革派開始失去優勢。

1987年11月：中共13大上，鄧處於「半退休」狀態並指定改革派趙紫陽作為總書記，大會決定繼續推進「改革開放」政策，但也帶來了由李鵬領導的中央官僚「保守派」的重組。

1988年6月：北京大學發生的謀殺學生案激發了學生抗議，反映日漸增加的不滿，尤其是在城市中經濟改革政策導致通貨膨脹率到達官方宣佈的21%（非官方通貨膨脹率達到31%）。

1989年1月：學生發生暴動反對非洲留學生。

4 月 15 日：胡耀邦逝世，據說他的死亡發生在政治局進行激烈的爭論期間。而這加強了官僚體系內「保守派」的力量以反對趙紫陽。

4 月 17 日：10 萬名學生在天安門廣場示威以紀念胡耀邦和支持民主。

4 月 21 日：學生繼續進行示威並且在當夜控制天安門廣場。

4 月 22 日：隨著胡耀邦的葬禮在人民大會堂舉行，天安門廣場上的示威仍然在繼續。

4 月 24 日：在北京學生開始罷課。

4 月 27 日：不顧當局的禁令，5 萬名學生前往天安門廣場遊行，獲得了一百萬群眾的支持。

5 月 2 日：學生領袖們騎著自行車前往北京各地的政府部門和黨的辦公室以要求當局和他們進行對話。

5 月 4 日：學生遊行至天安門廣場，廣場上的群眾人數達到 10 萬。學生在其他 10 個城市中舉行了遊行。

5 月 13 日：1,000 名學生開始絕食抗議以支援在電視轉播中的學生和政府辯論中提出的要求和其他民主改革。稍後另外 2,000 名學生加入絕食抗議。

5 月 15 日：戈巴契夫抵達北京，學生對廣場的佔領變永久化。

5 月 16 日：示威仍然在繼續，戈巴契夫和趙紫陽在人民大會堂進行會面，當時有 25 萬人聚集在外面的廣場上。在上海和其他五個省會城市發生抗議事件。

5 月 17 日：一百萬人在北京示威。在其他七個城市發生抗議。

5 月 19 日：軍隊開進北京。上海電視臺播放了學生和當局之間的長達三個半小時的辯論。

5 月 20 日：政府宣佈戒嚴法實施。政治局只有趙紫陽反對戒嚴決定。學生和工人們大規模動員起來建立路障以阻止軍隊向廣場開進。絕食抗議停止了，但是人們繼續佔據廣場。在 20 個城市中的發生示威。

5 月 21 日：示威仍然在繼續。北京的軍事指揮官公佈戒嚴法。一百萬人在香港進行示威。廣泛傳播的李鵬辭職的傳聞稍後被證明是錯誤的。

5 月 24 日：「改革派」的人大委員長萬里結束了對美國的短暫訪問而且試圖集結溫和主義的力量。但是，李鵬贏得軍隊領導的支持。

5 月 25 日：示威的規模開始變小。

5 月 28 日：中國大陸的運動有所衰退，而且官僚中的保守派繼續鞏固他們的權力。但是在葡萄牙的殖民地澳門和香港發生了最大規模的遊行示威。

6 月 4 日：軍隊重新佔領天安門廣場，屠殺了數以千計的平民。此後發生了遍佈全國持續一周的群眾抗議、示威和罷工。

訂閱〈社會主義者〉雜誌

反對專制政權打壓出版自由

社會主義行動為了宣揚國際社會主義理念，對抗剝削和壓迫勞動者的資本主義，除了走上街頭組織抗爭，亦創辦〈社會主義者〉刊物教育群眾宣傳理念。最近中共因畏懼中東革命浪潮蔓延內地，對反政府人士嚴加打壓，我們刊物的內地支持者亦身受其害，受到當局騷擾和監視，請大家支持我們繼續出版，誓不妥協地向極權抗爭。

《社會主義者》原價每本\$25

請將姓名、聯絡電話及寄件地址電郵至socialist.hk@gmail.com
可以HK\$100訂閱五期《社會主義者》雜誌，即買四送一

莫哭泣，組織起來！

Don't Mourn, Organize!

社會主義行動

www.chinaworker.info

大陸售價：RMB15.00

香港售價：HK\$35.00

